



作家池莉在小说《生活秀》中写道：吉庆街是“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在这里，一位名叫叶梦的女孩，也曾经有过她的艺术梦想和生活梦想。

叶梦，1989年生，湖北孝感人，高二时辍学。2012年，叶梦带着心爱的手风琴，随着姐姐叶苗到吉庆街卖艺，两人的收入供弟弟妹妹上学。

吉庆街是个激发艺术创作的生活秀场，很多人慕名而来，不少外地明星大腕到了武汉，都会来坐坐，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原生态的草根艺术，领略极具市民化的“汉味”文化。2012年7月17日，叶梦在为来自北方的客人演奏手风琴时，男性顾客用手打着拍子，打量着叶梦，很是欣赏的样子。当被告知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时，叶梦不禁有点不知所措。

这就是吉庆街，一个无拘无束、没有任何身份包袱的地方，一个释放人性而又难以言喻的地方。

（图 / 文 周国献）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 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周 敏

编 辑：华 蕾 张川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城市之根

<<< <

4 盘龙城遗址水下考古探秘 / 辛明山

扶贫路上

<<< <

8 驻村扶贫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 赵英俊(口述) 杨文广(整理)

12 他倒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 / 高 池

精工匠心

<<< <

15 爱洒荆楚的健康天使 / 周 静

山有黄门

<<< <

21 当时明月在 又照君归来——忆张景龄教授

/ 孙煜林 肖文精

24 从中南民院道路上走出来的故事 / 潘毓明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 年第 7 期 (总第 333 期)

委员天地

<<< <

- 27 当好“娘家人” 为妇女儿童代言 / 魏 静
30 新媒体就是我的抗疫阵地 / 冯伟华
33 直升飞机“直投”捐赠 只为物资最快抵达 / 黄 睿

往事漫忆

<<< <

- 39 看图有师赵学田 / 林道生
43 我拍我写“半截桥” / 王东升

史海钩沉

<<< <

- 48 “省一中”的变迁 / 张新强
56 1938 年唱的《保卫大武汉》是哪一首 / 曾宪德

楚风汉韵

<<< <

- 60 任桐祖孙的江城情怀 / 郭燕华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盘龙城遗址水下考古探秘

◇ 辛明山

从2013年起，盘龙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从服务于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出发，探究盘龙城聚落布局和地理环境变迁。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四家单位为主体，组成盘龙城考古工作队，并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等多家单位，在盘龙城遗址范围内水域开展大规模的水下考古勘探测绘工作，意图通过探索新的考古领域，复原盘龙城遗址在商代以及商代以来的地貌环境和变迁过程。

作为盘龙城考古工作队的一员，我有幸采访了当时水下考古的亲历者，在他们的口述和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为广大读者

简要介绍一下盘龙城遗址近几年的水下考古工作历程和成果。

探秘缘起

现在的盘龙城遗址可以看到的主要是几处低矮岗丘，如杨家湾、楼子湾、大邓湾、杨家嘴、李家嘴、王家嘴、小嘴、艾家嘴等，周边被盘龙湖、破口湖及府河等包围环绕。在与遗址核心区隔湖相望的北侧童家嘴、西侧小王家嘴以及东侧丰家嘴等地点也曾发现有商代遗存。就目前的地理环境而言，各个地点之间隔着盘龙湖，即使如今在彼此之间往来的话，交通也实为不便。那么，商代盘龙城先民之间是靠水路交通往来吗？

考古队员很快有了答案。我们观察到

每年的枯水季节，都会在盘龙湖岸边以及湖水下面发现大量的碎陶片、石块等商代的遗存，还会采集到一些石器、铜器、玉器等文物，甚至在湖水、河水退去之后也曾发掘过不少商代贵族和平民墓葬。

2014年12月的一天，武汉大学的陈晖博士带领几位考古队员和民工在盘龙湖边进行考古测绘作业。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和湖边潮湿的寒风让人寒冷难耐，其中有一位民工师傅想到退水的湖边捡些枯草败叶用来生火取暖，结果在草丛里随使用脚一踢，发现了一块商代青铜碎片，最后竟发掘出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还出土了10多件珍贵文物。这座墓葬所处的位置地势较低，在夏季丰水期被淹没于湖下，只有到冬季才会显露出来。

湖面之下经常暴露出来的文物和遗迹说明了商代盘龙城周边的水位远远低于现今的水位。通过梳理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文献，我们得知明清以来修筑的防洪堤坝导致如今盘龙湖的形成，并直接造成了盘龙城遗址周边水位的抬升。那么，盘龙湖下面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商代盘龙城的地理环境又和现在有何不同呢？

问题引领考古。我们决定对盘龙城遗址的水下区域展开考古工作，对商代盘龙城的地理环境一探究竟。

有序开展水下测绘和勘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整个盘龙城遗址面积接近4平方公里，对每一次考古发掘的具体位置和勘探的成千上万个探孔进行精准定位是做好盘龙城考古工作的基础。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和不懈努力，目前盘龙城遗址已经建立了永久的三维坐标系统，我们现在能够做到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考古发掘勘探数据在地理坐标系统中有着精准记录。

作为盘龙城考古工作队的总领队，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早已对盘龙城即将要开展的水下考古工作做好了周密的安排：第一步，开展盘龙湖湖盆地形的测绘，了解盘龙湖的地形地貌；第二步，对盘龙湖底进行系统的采样勘探，掌握盘龙湖底的历史文化堆积；第三步，选择合适的地点，



2016年11月，盘龙城考古工作队与武汉大学合作开展盘龙湖水下考古测绘作业

进行水下考古发掘，观察盘龙城的历史地理环境变迁过程。

2016年11月，盘龙城考古工作队与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胡庆武老师合作开展对盘龙湖水下地形的勘测工作。当时，团队选择了一条吃水深度0.9米、长约11米的小型渔船作为测量船，搭载RTK定位系统与单波束测深仪对水深约1~4米的盘龙湖进行联合作业。按照25米的间距布设测量航线，并每隔7米进行测点记录深度。考古队员操纵测量船沿着布置好的航线进行航行，采集三维坐标数据，最后制作完成盘龙城全遗址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通过水下考古测绘数据，得知盘龙湖湖盆底部较为平坦，湖底最低点高程为海拔16.4米，大部分区域在海拔17.2~19.5米之间。研究显示，盘龙湖在丰水期的水位峰值为海拔22.6米，此时湖泊面积为1.52平方公里，而枯水期的水位最低降至海拔19.5米，此时湖泊面积缩减为不足1平方公里。

在对盘龙湖湖底地形地貌有了初步了解之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我们又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姚书春、李春海、陶井奎等专家合作，对盘龙湖进行水下钻探。钻探设备选用专业的小型可组装拆卸式水上钻探平台，由橡胶浮筒、碳纤维平台、铝合金钻架和钻具等组成，并有一条小型皮划艇配合作业。在搭建的小小钻探平台上，七八个考古队员冒着刺骨寒风，分工有序，密切协作。有的人在漂泊不定的盘龙湖中采取与湖岸平行、间距50米的布孔方式钻探取样，有的人现场观察探孔内的地层分布情况并登记考古信息，还有的人负责拍照摄像记录工作过程。由于湖底深浅不一，再加上文化堆积厚度也不一样，有的探孔深度达10米以上，水上作业难度大，

一般一天只能打三四个探孔。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们在盘龙湖打了三条勘探带，探孔数量达100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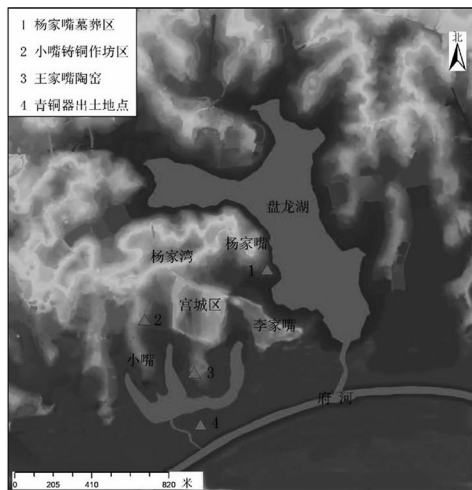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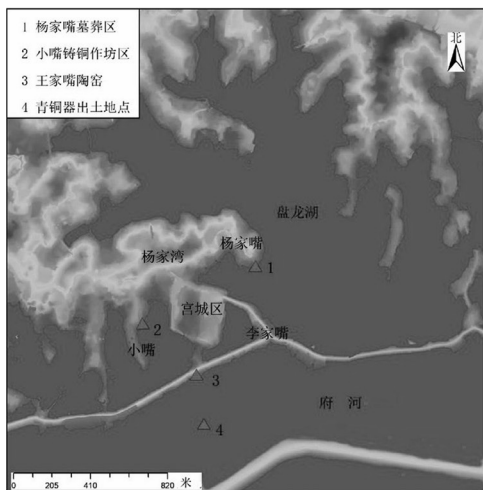
水下勘探表明，近现代淤泥层下有商代文化堆积，堆积的最低高程为海拔17.5米，商代盘龙湖的湖水面积不大于0.4平方公里，约为当今湖泊面积的1/4，甚至在枯水期会降至更低，只是一个深约1米的小型湖泊或沼泽。也就是说，现今盘龙湖的大部分区域在商代是连成一片的陆地，盘龙城先民在此生产生活，这种地势低洼的临水滩地在当时是发展农业经济和设置一般居民点的最佳选择。我们已把勘探采集的样品送至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鉴定分析，说不定能发现盘龙城商代水稻栽培的有关农业信息线索。

抓住机会进行水下考古发掘

2016年夏季，武汉发生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盘龙城遗址险象环生。2017年上半年，黄陂区政府组织加固盘龙城段府河堤坝，盘龙城遗址周边的湖水被控制在较低水位，这为盘龙城考古工作队提供了难得的水下考古发掘机会。考古队员们趁着破口湖湖底干涸，在处于小嘴铸铜作坊发掘区与盘龙城宫城西城门之间暴露的大片滩涂上布设了一条东西长达150多米的超长探沟。考虑到对遗址原貌的破坏和工作压力，最终只选择两处地点进行分段发掘。

由于地下水位较浅，随着发掘的深入，探沟内不断出现大量渗水，短短一两个小时积水就达1米多深。为了保障水下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考古队员们不得不边抽水边发掘，还必须时不时地盯着仅有2米宽的探

沟两壁，生怕发生塌方。一开始发掘出的是湖底青灰色的淤泥，泥土中时常能够发现商代的陶片，但也有大量明清时期甚至当代的瓷片。当发掘到 1.2



盘龙城遗址当代地貌（左，水位 22.6 米）和商代地貌（右，水位 17.5 米）

米以下的深度时，出现了一层土质较硬的地层，包含物全部为商代的陶片，堆积的厚度有 0.9 米。大家经过仔细辨识和讨论，一致认为这一地层是盘龙城商代先民在此活动后所形成的文化堆积。经过测量，我们得知探沟中的商代文化层最低位置为海拔 18.05 米。这意味着破口湖区域商代的原始地面比现在的湖底还要低 2 米以上。本次在湖底淤泥之下的考古发现刷新了我们对盘龙城遗址的认识，也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新去思考盘龙城遗址的古代人居环境了。

揭开盘龙城水下的面纱

盘龙城遗址至今已经历了 3500 多年的历史 and 地理环境变迁，最终形成了被当代高水位河、湖环绕的地貌形态现状。我们把水下考古测绘、勘探和发掘得出来的数据资料汇总研究，逐渐揭开盘龙城遗址水下的面纱，得到了商代盘龙城低水位的真实地貌形态。

盘龙湖和破口湖内的商代文化堆积最低的分布位置分别是海拔 17.5 米和 18.05 米。在 1974 年修筑府河堤坝之前，盘龙城遗址

周边水域与府河一直处于自然连通的状态，我们据此推测商代盘龙城周边的水位峰值应为海拔 17.5 米，这比当代盘龙湖丰水期海拔 22.6 米的水位低了 5.1 米，当时盘龙城的陆地面积比现今遗址可见的陆地面积要大 1.5 平方公里。在商代低水位时期，盘龙城遗址之中的各个岗地，例如艾家嘴、王家嘴、杨家嘴、李家嘴、童家嘴、小王家嘴等，相互之间均可通过陆地连接起来，形成密集分布的城市聚落布局状态，可以想象那是一派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景象。

现代科学技术的助力，让我们考古人得以拓展探索更广阔的盘龙湖水下世界。沧海桑田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盘龙城遗址 3500 多年的变迁过程中。

（辛明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驻村扶贫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 赵英俊（口述） 杨文广（整理）

算算时间，我从事精准扶贫工作已经3年多了。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进驻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和绿化村里的每一天，我都用心记下当天的所见、所感，我把这些当作对生活的一种回馈、工作的一种激励、生命的一种尝试。在这里，我认识的不仅是街干部、村干部，更多的还是贫困户和村民，如今走在绿化村的田间地头，总有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

（一）

2015年，全市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市驻村扶贫攻坚工作队组派工作的通知精神，经市政协机关领导研究决定，委派我作为山坡片区扶贫负责人和绿化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2012年，我曾在新洲区旧街杨家山村开展过扶贫工作，应该说有

一定经验，但精准扶贫与以前的扶贫有很大区别，挑战和要求都非常高，我心里难免有点“打鼓”。但当秘书长通知我代表单位去参加精准扶贫驻村时，我一口答应了。我是一名党员干部，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了解农村的落后，也知道农民心里想什么、需要什么。虽然条件有些艰苦，但如果能尽自己微薄之力为村里做点实事，帮助农民解决些实际问题，吃点苦不算什么。

第一次来到绿化村是在2015年底。路途非常遥远，从单位到村里足有100多公里。绿化村给我的印象是年轻人不多，交通很不便。因为泥巴路的缘故，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以前绿化村百姓出行的真实写照，村里的各种农作物也运不出去。村湾的环境不太好，泥巴路两旁到处是随意堆积的农家肥、苞米杆。我在跟村委会干部的座谈中了解到，绿化村

集体经济仅靠一点水面租金，年收入仅3万元，村级负债却有17万元，村部基本的正常开支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搞活村集体建设了。我当时很担心、很有压力，但我心里明白，组织把我选派到这里，正是因为这里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怀和干劲带领绿化村走上脱贫致富路。

（二）

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山坡街是市政协胡曙光主席的联系点，市政协机关作为山坡街道的牵头单位，负责22个贫困村工作队的管理工作。胡曙光主席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3年多来，先后10次带队赴山坡街调研督导精准扶贫工作，走访慰问贫困户，与贫困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其家庭、生产、生活等情况，视察了解精准扶贫村集体产业项目成效情况，要求区、街、村和驻村工作队要形成脱贫攻坚合力，确保山坡街片区脱贫攻坚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倪子林秘书长也多次到山坡街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为了把领导的意图落实到位，全面掌握山坡街贫困村扶贫进展情况，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着重调查22个贫困村，听汇报，看台账，看扶贫项目和包保到户落实情况，走访贫困户听取意见反馈，查驻村工作考勤记录。同时，每年多次组织山坡街片区扶贫工作队召开会议，传达省、市、区扶贫文件精神，听取扶贫工作队意见。通过联合巡视督察，不断推进扶贫工作任务落实。各个扶贫工作队同心协力，经过前

期的不懈努力，2016～2018年全街已有22个贫困村、1607户、3423人出列销号，顺利通过了市、区、街三级验收。同时，借助精准扶贫、“三乡工程”等优惠政策，推进产业扶贫，带动持续稳定增收。依托味美呆、亘谷源等重点企业，建设了砂糖橘基地、食品加工厂、光明茶产业园等项目，努力培育乡村振兴示范点。

（三）

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别，确定扶贫对象。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真扶贫、扶真贫的要求，我组织工作队队员同绿化村村委会的干部一起，到村里8个自然湾村民小组进行逐一摸底排查，精准识别，严格对照评定贫困户的标准条件，认真把关，进一步核实确定扶贫对象；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村委会将拟定的扶贫对象进行公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公示结束后，将拟定的扶贫对象报上级审批核定，经上级审核后为帮扶对象建档立卡。



2019年2月1日，市政协主席胡曙光（右三）、秘书长倪子林（右二）一行视察绿化村百亩综合种养基地项目

我和扶贫工作队队员同村里的干部一起，走村入户，与贫困户面对面交流，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我常想，扶贫攻坚是我们党员干部的一项政治任务和共同责任，每名党员干部在帮扶工作中都应发挥作用。为此，我积极向市政协办公厅领导汇报，建议根据贫困户家庭贫困不同情况，研究确定机关党员干部“一对一”扶贫工作方案。我一面在参与“一对一”帮扶的党员干部中宣传扶贫工作政策任务，努力发挥党员干部帮扶工作的力量；一面做好贫困户的宣传 work，正确引导贫困户树立不等不靠的思想，力争在扶志与扶智上下功夫，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经协调组织，机关参与“一对一”帮扶的党员干部每年4次到绿化村的对口贫困户家里走访慰问，送钱送物，帮助贫困户排忧解难。

村民杨玉红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肢体残疾，韩至早是名聋哑人，夫妻二人因残致贫，平日靠种植谷物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自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政府免费给她家盖了一栋新房，一家人的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住上新房的杨玉红夫妇想着勤劳致富，让生活过得更好。有天晚上，杨玉红在电视上看到一档农业节目讲养鸡致富，她有些心动，激动地打着手语告诉丈夫，韩至早认真地点了点头，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同。但是大规模养鸡，两人都没有经验，从何做起？这时，我们扶贫队和杨玉红家结成了“一对一”结对帮扶关系，扶贫干部多次走访，倾听了解其需求和打算后，通过政策兜底和产业扶持，为其“量身定制”了脱贫方案，不仅圆了她养鸡的心愿，还拓展了多个种植、养殖项目。以前，她们家只种植水稻，我们来了后，建议增加种植樟树。为了让村民掌握种植、养殖技巧，我们邀请农科

院专家普及农业生产常识。每次一有讲座，杨玉红就去听。她说，没想到种树都有讲究，春天要注意每株的间隙，不能过密；夏天要在树干上刷石灰水，用布包起来防止日灼。这些知识她以前都不知道，太有帮助了。现在，杨玉红家养了200只鸡、1300斤虾，种植了数亩谷物和300棵樟树。2019年，全家人均收入达到了19105元，比脱贫前翻了5倍。

几年来，我们还帮助贫困户董书全申请了农机补贴并购置旋耕机；为贫困户韩宗政因车祸受伤的孙子组织捐款；帮助贫困户李金菊，协调办理其儿子的落户手续；资助贫困户陈顺枝2万元，用于其就医手术和儿子的学习；资助贫困户韩至龙1.2万元，为其修缮受洪灾损坏的房屋；协调帮助特困户韩涛申请小额贷款5万元，在保福街租门面开办副食店创业；为特困户孙亮筹资捐款，帮助修缮养屯鸟棚舍、挖掘屯鸟池、购进种苗，鼓励他身残志坚、主动脱贫……有关事迹在中央七台专题播放，受到了广泛好评。

（四）

针对绿化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我和市地铁集团参加扶贫工作的同志分别将绿化村集体经济的情况向各自单位领导汇报，争取双方单位领导支持。市政协和市地铁集团领导都很重视，表示全力支持绿化村扶贫工作。有了双方领导的支持，我和市地铁集团扶贫工作组、村委会干部一起，及时地向山坡街领导汇报，争取在绿化村开发建设107亩的综合种养基地项目，得到了山坡街工委的大力支持。经过精心策划、设计、审批，市地铁集团投资352万余元为绿化村集体建成了百亩综合种养项目，每年为村集

体创收9万余元,实现了村集体脱贫任务。全村47户贫困户,除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以外,一般贫困户帮助其开展种树苗、种湘莲、养猪、养鱼、养虾、养鸡等家庭产业项目。根据种养的数量,村委会从扶贫款中为贫困户提供种苗基金的支持。此外,还争取市园林部门和市地铁集团帮助绿化村贫困户销售苗木共40多万元,收购贫困户农副产品25万余元。争取各项扶贫政策,帮助2户特困家庭实施危房改造,确保实现“危房清零”;帮助5户贫困户享受低保政策;帮助6户贫困户子女落实助学扶智和“雨露计划”政策;帮助11户贫困户解决务工就业问题;帮助28户贫困户申请提高低保和五保标准。2016年底,绿化村在武汉首批脱贫出列,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销号。绿化村驻村扶贫工作队也被评为2016年“全省第六轮‘三万’活动优秀工作组”“武汉市2016年度脱贫攻坚优秀工作组”。截至目前,绿化村无一人返贫,部分贫困户已迈向致富之路。

(五)

为了巩固脱贫成效,2016年以来,我同村委会的党员干部多次开会研究,落实帮助贫困户发展春耕生产、家庭养殖产业项目,为需种养的贫困户家庭统计品种数量,经村委会研究确定提供种苗补贴,充分调动贫困户增收的积极性;还邀请农业专家为贫困户举办专题知识讲座,提高贫困户的农业种植知识水平。2018年,为进一步巩固村集体脱贫成效,在市、区支持下,申请了9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在百亩综合种养基地扩建1200平方米的鸡舍,可养殖3.5万只蛋鸡。该项目的建成投产,为村集

体带来7万元年收入。村集体产业红红火火,吸引一批能人回乡——村民陈尚斌开了一家农家乐,创办山坡街第一个莲米加工厂;党员唐汉东回乡投资养殖蛋鸡,市地铁集团帮助其修建100多米的碎石路,方便产品和饲料运输;能人董义伦回乡承包蛋鸡养殖场,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优先面向贫困户招工……这些举措,推动了资金和人才回流,这些能人反哺家乡建设,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

在完成绿化村脱贫和成果巩固的基础上,我们又在美丽村湾建设、村湾道路建设方面下狠劲,旨在打造一个愈发美丽、干净的绿化村。2018~2019年,我与市地铁集团领导沟通,筹资500万元,参照城市支路标准,对绿化村1~8组5.6公里的主干道进行破损路面修补、修砌挡土墙、铺设沥青路面、设置减速带等,绿化村所有主干道都焕然一新,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出行和农副产品的运输。我还与江夏区领导沟通,从2017年起连续3年,每年由江夏区政府投资100万元用于绿化村两个村湾小组的美丽村湾建设,整治村民房前屋后的环境。目前已经完成了4个村湾小组的环境整治建设,为村民房前屋后修建了排水渠、挡土墙、硬化地面、铺设彩砖等,村湾环境提档升级,村容村貌有了较大改善。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我一直记着习总书记说过的这句话。3年多的驻村扶贫,我对口帮扶的山坡街和绿化村脱了贫。脱贫攻坚让我的生命也变得更价值、更有意义。虽然我已经退休,但我会继续关注山坡街和绿化村扶贫工作,为此作出应有贡献。

(赵英俊:武汉市政协办公厅原副巡视员)

他倒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

◇ 高池

2017年3月3日，蔡甸区法院副处级法官李志强来到同心垸村，主持村“两学一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之后，他走访农户，就在去结对帮扶贫困户徐培青家途中，他突感身体不适，瘫坐在路边，村干部赶紧送他去医院。由于大面积心梗并脑梗，无情的病魔最终夺走他宝贵的生命。生命的指针永远停摆在56岁。

在同心垸村扶贫第一书记的任上，李志强做了16个月。

积劳成疾，扶贫第一书记倒在扶贫路上。《人民日报》、新华社、新浪网、《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纷纷采访报道李志强的事迹。

人生虽有时，“志”强永不息。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他“优秀法官”称号；省高院为李志强追记一等功；市委政法委和市法院党组决定在系统内开展学习李志强活动；蔡甸区委追授李志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全区开展向李志强学习活动。

在这个春天，他像一片树叶飘落，让我们对他的无尽思念空挂枝头。在这个春

天，他用生命，完成一座基层第一书记的雕塑，让我们读懂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

主动请命出任扶贫第一书记

时间回到2015年深秋。

蔡甸区委、区政府安排区法院负责4个村的扶贫任务，这意味着需要挑选4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出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当时，作为全国法院司法改革试点，湖北省刚刚启动首批员额法官的遴选工作，有64%的人将被淘汰出法官队伍，正处于紧张的备考阶段，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自然会影响即将到来的考试。在院党组为挑选4名扶贫工作队队长着急时，李志强走进法院党组负责人的办公室，说道：“让我去吧！”

“老李，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你不怕影响这次员额法官考试？”法院党组负责人对他说：“你年岁大，不在我们考虑的人选范围。你为什么非要下去扶贫啊？”

李志强说：“我也不说大话，我们单位副处级干部本来不多，现在大家都忙于应

考，我是老同志，就让我顶上去吧。再者我有农村工作经历，张湾街情况我也熟。当年回城时，我对送我的群众说过，有机会再回来和你们一起干。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实现我的诺言。”

法院党组负责人紧紧握着李志强的手，不住点头，半天无语。

下村那一天，李志强和他的工作队队员一大早就来到村委会办公室，简单安排办公住宿地方后，他就让村支部书记杨玉清召集村“两委”班子开会。李志强详细传达了头一天区里精准扶贫动员会的精神。杨玉清也参加了区里精准扶贫动员会，但他没有想到李志强把会议内容记得那么细、那么多，也没有想到李志强把会议精神吃得那么透、那么准。会后，杨玉清说：“李书记，你的记忆力真好啊。”李志强笑呵呵地回答道：

“哪里啊，我就两个字：认真。一则我开会做笔记认真，再好的记忆不如一只破笔头；二则为了今天传达好会议精神，我昨天晚上认真钻研会议材料大半宿，我笨鸟先飞。”

晚上，他回到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和工作队队员一道，起草同心垸村扶贫计划。

为了掌握最准确的材料，他夜以继日地上门调查。老百姓白天出外打工让他吃了闭门羹，他就晚上上门摸情况。听申请者介绍情况，还通过左邻右舍了解申请者的情况。有的农户因为他上门次数多了，问的话多了，不愿意接待调查。但李志强不厌其烦地一户一户地走访、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调查、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核实。同心垸村31户和95名贫困对象的确定，在走完所有程序上报上级部门后，一次性得到认定，实现了李志强“一次性地通过”的目标。

扶贫要实，来不得半点虚。李志强的扶贫日记本写满“认真”两个字。

要带着感情去扶贫

第一次走访来到徐培青家，徐家生活的艰难让李志强眉头不展，眼睛潮湿。低矮简陋的瓦房挤着一家三口，徐培青年老多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老伴严重腰肌萎缩，瘫痪在床；40岁的儿子因智力障碍没有稳定工作，没有成家。

李志强离开徐培青家，来到张湾街社区服务中心，把徐培青老伴的情况向中心工作人员做了详细介绍。工作人员咨询区残联，得到肯定答复，徐培青老伴可以申请办理残疾人生活补贴。2016年年底，李志强再次来到徐培青家，进门就把一张银行卡交到徐培青手里。

李志强准备走时，老人从堂屋抱出一个大南瓜，对李志强说：“李书记，您帮我们家这大忙，我也没有像样的东西送您，就送您一个南瓜，如果您瞧得起我老徐，就请收下。”

3月5日，阴雨绵绵。徐培青从一些村民口中得知李志强因病离世的消息，硬是不肯当真：“亲人啊亲人，您怎么就走了呢？我们一家都念叨您的好，我们只能在家门口给您烧点纸钱。”李志强突然因病去世，和徐培青一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有贫困户杨振红。

杨振红患有侏儒症，身材矮小。妻子先天弱智。夫妻两人育有一对女儿，一家人生活靠政府救济和亲戚接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第一次走访，李志强送去400元慰问金和食用油、大米等慰问品，离开时，他让杨振红在手机里存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对他说：“有事就打电话找我。”

2016年的一天，杨振红的大女儿杨明

利突发疾病，杨振红拨通李志强手机。

接到杨振红电话，李志强放下手中的工作，抽空回了一趟区法院，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区法院在全院发起爱心募捐活动，募集到2万多元，作为法院扶贫专项资金。李志强从中拿出2000元，交齐杨明利的医疗费。几个星期后，杨明利平安出院。从那以后，杨振红逢人就说：“李书记真是我们家的亲人。”

在同心垵村，贫困户都是李志强的穷亲戚，在他们眼里，李志强就是他们的亲人。对待群众，李志强没有架子，一脸和气。走在路上，遇到村民赶集，李志强会迎上前打个招呼，碰到挑担的，他会侧身让道，一句“吃饭吗”让村民激动半天；下到田头，看到村民劳作，李志强会看事做事，主动搭把手，帮个忙，即使无事找事帮倒忙，也让村民感动无比；进到村子，李志强会找村民聊天，帮留守儿童改作业，看空巢老人米缸有没有米。

初夏，徐培青家房前屋后南瓜花次第开放，谁的思念潮湿了我们的心扉？

扶贫路也是法治路

李志强第一次进村，看到进出同心垵村的唯一通道路面破破烂烂，听到过往群众怨声载道，就暗下决心，一定早日帮助村里翻修公路，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当年，他把帮助同心垵村翻修通村路列入扶贫工作队年度工作任务。

2016年，村道翻修工程获得区扶贫办、区交通局和张湾街等单位立项批准，但由于资金有缺口，工程到年底迟迟不能动工。心急如焚的李志强找到区法院领导，请求法院给予帮助。区法院党组决定从办公经费里挤

出3万元，支持同心垵村村道翻修。资金缺口补上了，工程随即开工。

随后的日子，李志强带领干部群众到施工现场开展义务劳动，工程进度迅速加快。

2017年4月，通村路翻修工程完工。走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村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念叨李书记的好，说他把路修到了群众心坎上。

2016年春，一件事情让李志强百思不得其解。张湾街扣件大王杨振军响应政府号召，从河北回乡，投资几亿元创办蔬果产业园，周边许多村的农民带着土地入股，到产业园打工，既挣工资又分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杨振军找到同心垵村，但任凭村干部磨破嘴皮，村民就是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杨振军的产业园。

李志强和村干部分期分批带着农民到杨振军的蔬果产业园参观，请在产业园打工的农民现身说法。回到村里，李志强亲自为农民解读政策法规，用法律为农民土地流转做后盾。签订合同时，李志强请来张湾街办事处财政经管部门的干部为农民“站台”。2016年，同心垵村向杨振军蔬果产业园流转土地1200亩，每亩为农民增收500多元。2017年春节，第一笔分红到账，有农民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别人种田我得租，打工赚钱心无忧。李书记是咱们的贴心人，帮我们找到致富路。”

2017年的春天，让我们记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吴运铎的故乡；吴运铎的故乡，让我们记住一个人，那个人是一名法官；一位法官，让我们记住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主题叫忠诚。

（高池：中共蔡甸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蔡甸区文联主席）

爱洒荆楚的健康天使

◇ 周 静

有凤来仪，杏林添彩；
以仁相济，德艺传馨。

她是留学女博士，拒绝国外高薪毅然回国，主动请缨下基层进行健康扶贫，在京山市创建了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曾荣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荆楚楷模”年度人物等荣誉。

——摘自《2019“荆楚楷模”十大年度人物事迹撷英》

我叫周静，1981年8月出生于湖北荆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99年，我考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2008年起先后到德国、英国、美国留学深造；2013年回国就职，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也是协和东西湖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在大家眼中和媒体的报道里，我是高

铁上救人的“侠女医生”，是奔走义诊行程过万公里的博士团成员，是为身患乳腺癌的孕妇抢救新生命的铁娘子，是孤寡老人口中“能剪脚趾甲的好女儿”，也是创造一天开创一个病区新纪录的“80后”女院长。但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就是一位普通的医生，做了所有医生都应做的本职工作，那就是治病救人。

学成归国 贡献力量

2013年，我谢绝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提供的优厚条件，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回国工作后，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各类政治、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工作中处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我的丈夫吴斌是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副教授、湖北省第五批博士团下基层成员。2016 ~ 2017 年，他在洪湖市开展医疗扶贫。“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省级医院差距太大了！”丈夫的感慨，拨动了我心里深处的那根弦，于是我也申请加入了湖北省医疗博士团，自愿到京山人民医院进行健康扶贫。2018 年，我提着简单的行李，带着梦想来到京山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扎根京山，投身脱贫攻坚战，开始了从医生涯的又一段经历。

湖北省博士服务团医疗服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优质人才资源和医疗专业技术优势，服务基层，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提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助力湖北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开展。在京山人民医院，我主要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和人才培养。除了日常管理工作外，我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医疗业务上。每周二上午是我的门诊时间，慕名而来的患者经常将诊室围得水泄不通，安排加号成了常态。无论多忙、多辛苦，我总是面带微笑、亲切问诊，因为我知道，对那些山区农村的患者来说，跋山涉水来这里看病很是不易，而我牺牲掉的只是午休时间而已。为尽快解除病人疾苦、缩短病程，我将自己的手术时间排得满满的，经常是一台接一台满负荷地工作；遇到特殊病人，周末也顾不上休息，更难以回家。短短 9 个月，我在京山接诊门诊病人就达 1000 余人，开展高难度甲状腺、乳腺手术 100 余台，凭借精湛的技术在当地甲乳外科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京山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手术病人做到了零转诊，周边县市包括应城、天门等地的患者也纷至沓来。我的付出换来了患者的健康、老百姓的赞许，这让我倍感欣慰。为把先进的技术留在京山人民医院，我还充

分利用时间做好“传帮带”，抓住术前、术中、术后等各种时机认真指导当地医生。在我的指导帮助下，京山人民医院甲乳外科逐步走向成熟，目前已可独立完成各种高难度甲状腺、乳腺手术，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5 项。

除了京山人民医院的工作，我还经常和医疗服务队一起下乡义诊，走进恩施、黄冈等地的贫困县，打通服务贫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一开始，我对这份工作所蕴含的巨大意义理解不深，现在却感触颇多。基层困难群众群体大、生活艰难、健康意识薄弱，为了生计肆意“消费”着自己的健康，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因为亲人患了重大疾病说垮就垮。再加上他们居住地偏远，到一个稍有规模的医疗机构看病，至少都得往返 4 小时以上。如果病情严重必须到省城三甲医院比如协和医院就诊，加上路上交通、预约挂号、排队检查等时间，看一次病甚至能耗时三四天之久。

2018 年 8 月，43 岁的余女士在网上看到我们组团到鹤峰义诊的消息后，天不亮就早早起床，将家里辛苦攒下的 60 个土鸡蛋用篮子和稻谷壳装好，径直来到县里的义诊地点等候。一来是为了复查，二来更多的是想当面对我表达感谢。家住鹤峰县的余女士此前曾查出患甲状腺癌，慕名找到我之后，由于病情严重，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她必须转到上级医疗机构进行手术治疗。一开始因为手术费的问题，她拒绝手术，不愿意给家里添负担，不积极治疗。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主动联系帮其转诊到协和医院进行手术并接受后续治疗。在我的耐心宽慰下，她终于答应好好接受治疗。健康扶贫的各项优惠政策是这些群众最大的福音，她的手术很成功，术后也恢复得很好，消除了她所认为的甲状腺癌病人存活率很低的顾虑。我

也想尽办法帮助她以最大的优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所以她们一家人心里一直非常感激我。还是在2018年，我们在黄冈市浠水县义诊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例疑难手术。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男歌唱家，甲状腺术后复发，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二次手术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极大，稍有不慎

术中损伤喉返神经就会导致声音嘶哑，但患者又是一个歌手，手术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当地医院医生感觉非常棘手，我的到来正好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在给患者做好术前安抚工作后，我给他们进行了手术指导和演示，最后成功、准确地切除了病灶。手术非常成功，患者的嗓音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一年来，我们的足迹遍布省内10个市、22个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行程近2万公里，惠及困难群众1万余人。

选择无悔 生命至上

从医之路，朝圣而行。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救死扶伤。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病人的需要就是对我的召唤。我很自豪，能用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爱心，为一个个垂危的病人托起生命的晴空，逐梦路上的我，无悔这份选择与坚守。

2018年5月1日晚，在深圳开往武汉的最后一班高铁上，一名男乘客突然发病，



2018年3月，周静（右二）在京山开展巡回义诊

呼吸、心跳停止。作为乘客的我听到寻医广播后迅即赶到现场紧急施救。中途靠站后，众人合力将男子抬下列车，在宽阔的站台上边继续进行心肺复苏，一边等待救护车。开车时间很快就到了，救护车却还没有来。由于是回武汉的最后一班车，第二天还要上班，大家便陆续回到车上去了，而我仍然坚持在站台上做心肺复苏。8岁的儿子跑到车门边催我回去，“你先回去找外婆！”我边对儿子喊边不停地跪地按压。在这期间，我跪在地上一次又一次有规律地按压男子心脏，累得气喘吁吁，衣服大片汗湿，但不敢停下抢救。5分钟后，两名120急救人员终于赶到并顺利交接。在面对病患的那一刻，深深刻入骨髓、融入血液的救死扶伤天职使我全然忘记了身处异地，忘记了即将开动的列车和母亲、幼子的催促。我的行动感动了列车上的乘客，大家纷纷为我点赞。后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事，我因此获得了阿里正能量万元奖金。得到奖金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认为医生

都会那样做的，便将获得的1万元奖金分批捐出，为京山敬老院老人改善伙食，赞助京山义工联环卫工人爱心早餐，帮助京山的困难学生等。

这一年，京山人民医院最热门的话题还有“周医生要给患乳腺癌的孕妇做手术”。26岁的秦女士在广州打工，怀孕7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患上乳腺癌。家人参考外地医院医生的建议，劝她先流产，再治疗乳腺癌。但秦女士难以割舍孩子，不愿意流产。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她选择回到京山老家治疗。我根据自己在国外治疗类似病例的经验，大胆提出治疗方案：在保全胎儿的情况下，对秦女士实施癌症手术。

但对未有此先例的县级医院来说，大胆尝试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孕妇发生意外，或者孩子胎死腹中，可能产生医疗纠纷。快过年了，我们还是把她转到上级医院吧！”同事们纷纷这样劝说我，秦女士的家属也对治疗方案表示怀疑。但我没有退却，我对自己的医术很有信心，更坚信医者要有

守护患者的担当。和秦女士商量后，我仍坚持原来的治疗方案。手术室内，拿着手术刀，我与死神展开较量。2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秦女士麻醉苏醒后，胎心监测正常。2019年4月，在京山市人民医院产科，秦女士顺利诞下一个健康的宝宝。“谢谢你，周医生！你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秦女士第一时间给我发来视频，喜极而泣。

眼见一个个患者摆脱病痛喜极而泣的场面，我开始体味到人生的另一番意义：自己所为不过是寻常之举，却可祛除病痛，让患者的家变得完整。

健康扶贫 托举幸福

遵从内心的真诚，用温柔的力量书写执着，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这就是我不变的初心。

2018年在京山人民医院工作期间，我主动要求加入医院义工队，成了义工队非常活跃的一员。我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

敬老院敬老、特校助残、结对帮扶贫困户等公益活动。特校有一名下肢残疾、行走困难的同学李煜，是京山人民医院对口帮扶的大山头村贫困户家的孩子。为改善她行走不便的状况，我请来武汉协和医院小儿骨科的连仁浩博士为李煜诊断治疗。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了解李煜的治疗情况。经过持续的康复



2020年1月23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周静（中）在协和东西湖医院ICU查房

治疗，李煜已经能依靠双拐自由行动了。而在爱心早餐店，天不亮就能看到我忙碌的身影。每当保洁阿姨大叔们接过我端来的一份份热气腾腾的早餐时，一声“谢谢姑娘”就会让我泛起幸福的微笑。在义工活动中，我还“收获”了一个女儿——结对了一个失学孤儿进行助学，将一直支持她到大学毕业。在京山期间，我走遍了京山众多贫困村和敬老院，捐款捐物、做义诊，我真诚的付出多次受到大家的赞扬，被京山市文明办和义工联评为“京山市优秀义工”。

广施爱心的同时，我也深谙，疾病是脱贫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如何防止因病返贫是我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东西湖区新沟镇谕口大队是我所在的协和东西湖医院的定点帮扶村。为做好精准扶贫这项民心工程，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先后多次带队进村调研，了解村情民风、基础设施、林农产业等基本情况，以及群众医疗需求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切实做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对象的帮扶工作和疾病防治工作，我带领医院扶贫干部坚持走到群众身边“送医送药送温暖”，协调医生为行动不便、就医困难的患者上门诊疗，让村民不出村就能享受贴心的医疗服务，打通了服务困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谕口大队对口扶贫工作中，医院筹措资金10万元帮助该大队116户住户进行厕所改造，对贫困人员进行入户义诊、健康教育及政策宣讲，推动关口前移，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我一直致力于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公平和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始终围绕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更好防病”的目标，全力抓好慢病健康扶贫各项工作，为贫困群众撑起了健康保护伞。2019年，我共举办巡回义诊24场，发放健

康宣教资料7790份，帮助万余名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和健康资讯服务。同时，身为协和医院教授，我还积极邀请30名协和专家在协和东西湖医院开展常态化门诊诊疗服务，累计接诊病患6800余人次、教学手术498例、日常查房1100次、授课183次，让协和专家进农场、进社区，实实在在为辖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逆行无畏 坚守一线

疫情如同一场黑风暴，在突然之间会席卷而至。在冰冷残酷的疫病面前，也总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在努力地钻木生火，用一簇簇火光烘热这片土地。2003年，“非典”病毒在全球扩散，22岁的我正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实习，和带教老师一起接诊了深圳第一例“非典”患者；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而来，当年稚气未脱的学子已成长为一名专家教授，我再次逆行而上，勇敢挑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

在此次新冠肺炎防疫阻击战中，我所在的协和东西湖医院是东西湖区定点治疗的主战场。1月22日，我接到任务，要在48小时内改造出10个隔离区，容纳床位297张。家已然无法回去，我匆匆收拾了一些洗漱用品，搬进了医院旁的酒店，每天都要接打100多个电话协调调度全院医疗工作，加班到深夜、半夜解决突发事件更是常事。每天忙于清点病人、改造病房、调配医护人员、培训、买设备、募捐防护用品。“赶紧、火速、紧急……”这是每天电话中，我说得频率最高的几个词语。隔离病房严重不足，专科医护人员配比不足，防护用品极其短缺等等，一系列非常专业性的难题，全都一下子摆在面前。

“排除万难，火速解决！一刻也不能停歇。”在我的带领下，医院上下同心抗疫，创造了每天开一个病区的“临空港速度”。从初一到初十，共开设了10个新病区，所有各类人员已经用到了极致。为了缓解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的恐慌情绪，我立下军令状，坚持每周进隔离病区查房两次。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都是气管插管的病人，插管后气道大开，气溶胶极易散布到空气中，是传染风险最高的地方。尽管有着“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荆楚楷模”等光环加持，我内心深处仍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位医者，救死扶伤是天职，“只有自己冲在最前面，其他医护人员才有信心、有决心跟我一起冲。如果我们都退缩了，患者怎么办？”

汉口市民张女士，面对媒体表达了对我的深深感激。1月10日，她的丈夫刘先生因发烧住进医院感染科病房，由于病情加重，几天后被转入ICU，进行了气管插管。重症监护室主任袁海涛，正是因转运刘先生感染了新冠肺炎。“袁主任住院后，我心里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找周静副院长求助后，她很有担当精神，主动加了我的微信，让我有什么困难就找她，她会尽力帮忙解决。”张女士说：“丈夫昏迷20多天，因合并了罕见的多重耐药菌感染，需要使用一种比较稀缺的抗生素，而医院没有，当时市面上也买不到，是周静副院长帮忙想办法调到了这种抗生素。周静副院长还时常去ICU查房，并先后3次组织协和医院的重症医学专家来给我的丈夫会诊。她们真的是医者仁心，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后来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我无法来送饭，在周静副院长的安排协调下，ICU的王燕琳护士长等护理人员，亲手给我的丈夫熬米汤、稀饭、银

耳汤等补充营养。是周静副院长、袁主任、屠医生、王燕琳护士长等医护人员的真情关怀与无私帮助，才让我丈夫的病情得到好转，脱离呼吸机。”

而经过23天与病魔的抗击，经历九死一生的袁海涛主任也终于挺过来了。他出院那天，特意去接战友的我感慨万分。我总觉得，他的经历似乎就是这场战役的隐喻，有伤痛、有倒下，但最终会站起、会胜利。

我感谢青春里那些艰难的时刻，那些和生命赛跑的争分夺秒，那些在暗夜里一边跟自己说着“加油”一边往前走的日子，是它们成就了今天的我，让我能有足够坚硬的躯壳去捍卫那些不可磨灭的柔软与美好，也有足够温暖的初心去拥抱那些终将到来的慈悲和懂得。我深深明白，那些在冬天失去的，在下一个春天都会还给我们。未来，我已做好准备，慎终如始，善作善成，不忘初心，守望家国情怀，用热血和奉献，镌刻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印记。

当时明月在 又照君归来——忆张景龄教授

◇ 孙煜林 肖文精

我国著名的有机磷化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景龄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他毕生致力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事业，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药化学研究所和农药学学科，培养了几代科技创新人才，为我国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的教育和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

1927年，张景龄先生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1946年9月考入私立华中大学化学系。据他的大学同学回忆，学校要求很严格，他们1951年大学毕业时，化学系只有8人顺利毕业。在大学期间，张先生追求进步，1948年纪念五四运动时，华中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了较大规模、有革命意义的活动，张景龄是组织者和参与者。他还参加了“疆风舞蹈队”，对推广反

映工农、反映兄弟民族的舞蹈发挥了积极作用。1948年年底，他又加入了“苍海社”，经常参加该社组织的革命书籍读书活动。1949年1月到2月的寒假期间，中共地下党决定将学校内的学生组织起来，组成生活互助小组，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分别编入小组进行帮助、教育群众的工作。张景龄是互助小组的重要成员和积极分子，表现十分突出，得到了周围同志和党组织的高度赞赏。1949年2月，还在读书的张景龄便由当时的地下党员李丽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党组织在华中大学公开时，张景龄已经是负责人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原华中大学为主体，集中了中华大学等学校组建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5月到1956年9月，张景龄先生先后在学校化学系任助教、讲师。后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后，于1958

年11月公派至苏联喀山基洛夫化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苏联著名的有机磷化学家Arbuzof教授。1962年10月回国后，张景龄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化学系继续担任讲师，后历任副教授、教授，农药化学研究所所长，华中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

(二)

张景龄先生是华中师范学院农药学的创始人，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农药化学家。他的研究理念是“着手于理论，落实于应用”，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不对称硫代磷酰胺烷基芳基酯化学结构与杀虫活性关系的基础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成功创制了新型杀虫剂“水胺硫磷”“甲基异柳磷”等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农药，先后在10多个农药企业生产，远销海内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替代高毒性、难降解的“六六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先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2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985年）、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1988年）等多项奖励，奠定了华中师大农药学的国内、国际地位。他创建的农药学目前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湖北省优势重点学科。

此外，张景龄先生系统地研究了稠环系三唑磷茂啉化学，成功发现了双稠环、三稠环磷茂啉类化合物的合成方法、波谱性质、化学反应和构型特征，发展了2-胂基苯并噻唑的磷酰化反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应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已年过花甲的张先生又在中国首先开展了“磷烯正离子化学”这一前沿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张景龄先生一生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由于他在磷化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从1982年起连续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和苏联举行的第八届至第十一届国际磷化学学术讨论会，并在第十届国际磷化学学术讨论会上担任了助理主席，为对外交流、扩大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影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世界名人词典》，并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1992年，被湖北省科协授予“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三)

张景龄先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尽管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但他依然承担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任务。在校任教期间，张先生上课有两个特点：一是逻辑清晰，二是深入浅出。他特别重视教材的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总是选择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重点大学相近的教材，还亲自主持编写了《农药化学》等教材，出版了专著《有机反应活性中间体》。在授课中，他总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发展的前沿动态融入教学内容，介绍给学生。他对青年教师采取“定方向、压担子、一带一、老带少”的办法，让他们尽快成长，走上讲台，成为骨干。

张先生要求别人严格，要求自己更严格。为了更新知识，他在50多岁时仍坚持自学统计学、量子化学、运筹学；他通晓俄语、英语，但仍努力学习德语、日语。年过花甲后，张先生又要求自己学会计算机，为此他经常向年轻人请教。他把这些新知识都

贯穿到教学之中，应用到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之中。

张先生在教学生涯中指导了很多的研究生。他注重在课题组内提倡和营造一种活跃的学术氛围，为学生的科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他在给研究生安排课时时，会根据学生的特点给出相应的研究方向，做到因材施教，并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让学生大胆地尝试。他亲自指导了20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对每个学生从选题到实验，从数据的收集、整理到论文的撰写，都一环一环把关。在把好科学关的前提下，他又放手让学生在学中展现自己的才能。他经常向学生提问，引而不发，当学生在做论文中不顺利时，他总是鼓励、教育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二字，要求他们既要有攀科学高峰的勇气，又要有深入研究发现问题的能力，并和学生共同研究失败原因，为他们指明方向。张先生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学生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培养的学生已有大批成为了海内外教学科研的骨干，在他们的心目中，张先生的榜样作用永存。

1991年11月，全国第二届磷化学讨论会在华中师大召开。张景龄先生以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及学识，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来几乎所有的磷化学研究机构和生产单位的代表，其中包括中科院学部委员陈茹玉、赵玉芬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承业、徐玄龙、杨华铮教授等，使得这次会议成为磷化学届最隆重的聚会，为华中师大赢得了荣誉。

（四）

张景龄先生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他的业余爱好十分广泛，如书法、旅游等，

他尤爱中国传统文化，喜欢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欣赏名胜古迹。但他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论出差到何地，总是一有闲余时间就一头扎进当地的图书馆，不放弃一切机会收集更多的资料，学习更多的知识，以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促进科研的突破。为此，他不得不放弃了许多个人的文化精神享受。无论是严寒冬天还是盛夏酷暑，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书房，成了他的工作常态。

付出终有收获，张先生的许多科研成果正造福于人类。他所研制的10多个农药品种正保护着粮棉油农作物的生长，为我国的农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国际有机磷化学的许多发展都与他的工作分不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某些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堪称世人楷模。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张先生病重期间，仍为科研和教学呕心沥血。重病住院前夕，他仍乘公共汽车亲自去同济医大联系毒理试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着磷化学事业和人才培养。张先生早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可他异常谦虚，多少次去医院看病，为节约学校和所里的开支，坚持乘公共汽车。住院期间，他把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捐献了出来，交给了党。先生以他那“无私奉献、忘我工作、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崇高品德及精深学识影响着无数的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们。先生的精神永存！

（孙煜林：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辅导员；肖文精：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化学学院院长）

从中南民院道路上走出来的故事

◇ 潘毓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对提高管理水平非常重视，管理学纷纷进入高校，不少专业开设了这门课程。当时，我正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军事经济学院着手编写《现代辅助管理学教程》，以填补此类教材的空白。说起来很凑巧，应地方院校的要求，经学院系领导同意，我开始在硚口区广播电视大学讲课。这个学校办的班，也有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老师来授课，于是我有机会认识了民院的一些系（部）主任。1984 年，我应邀参加了湖北省写作学会，认识的人更多了。不少学校请我帮忙讲授时兴的秘书学和公文写作课，民院还派一位 50 多岁的司机开小车接送，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不久，军校开始精简整编。这时，中南民院有系（部）主任动员我转业到民院任教，说我是少数民族干部，专业对路，为人也好，下决心吧。就这样，经过批准，我转业到中南民族学院，安排在干训部任教。

1986 年，我到中南民院任教时，学院刚恢复不久，院内道路还没有命名。现在，我要讲的故事主要涉及三条路段：即由民族学博物馆前的泽霖路、经南湖园的民族路、至行政楼的团结路。本文主角吴泽霖教授，师生都敬称他“吴老”。可见，路是因名人、有深意而得名的。这三条路段，成了我与吴老偶然相遇而交谈学术研究问题的场地。

（一）

我虽是少数民族一员，但从未学习和研究过民族学，对这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到中南民院工作后，我有几次到民族地区招生，广西民委的同志送给我一些民族图书资料，还对我说，到民院工作，就应该多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各方面的知识，这对教学有好处。此时，我才认识到“入乡求学”的紧迫感。

在学习民族学的过程中,中南民院的一些老师和系(部)领导经常给我提示:我院民族图书资料最丰富的是民族学博物馆,我院吴泽霖教授就是全国的社会学、民族学泰斗之一。这时,我才真正找到了较好的学习场所,找到了把民族学与普通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指导者、学术研究的引导人。

从此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到民族学博物馆看书学习、摘录资料。不久,我发现吴老也常在下午到博物馆看书找资料。我想,吴老平时工作、学习忙,我不能打扰他,但是下班的路上,却是我向他请教的好机会。

1987年春的一天,夕阳红霞,和风徐徐,下班时间到了。我从窗口望去,发现吴老正走到博物馆前小广场,我赶快下楼跟上去。

“吴老,您好!”

吴老看着我,问道:“你好,你是……”

“我是干训部的教师,我姓潘。下午有时间,一般都到这里学习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我想利用下班走路的机会,向您请教有关少数民族知识和科研的问题。”

“不要说请教,我们讨论吧,不过我走路很慢。”

“慢的好,我们可以多说话。”这时,我发现吴老很在意,于是我开始提问题。

“吴老,我讲的课是边缘学科,其内容与相关学科都有交叉,在教学中,应怎样体现民族知识?来民院之前,我授课和写学术论文,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现在不同了。”

听了我的问题,吴老答道:“民族高校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主要是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教学应体现民族性。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你现在已经引起注意,这很好。你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学一点民族知识,做到

学一点、教一点、用一点、写一点这方面的学术文章,给院报、学报投稿。一个人只要有方向、有毅力,就会有提高、有收获。”

吴老的话给我增添了信心。按照吴老的指点,我注意把教、学、研、写结合起来,先后在我院《民族高教研究》《中南民族学院院报》和华中师范大学《终身教育研究》发表了4篇学术文章。应该说,这是我到地方高校任教后取得的第一批成果,是吴老的指点开始见效。

(二)

有了上述经历和收获之后,我在教学实践中又悟出了几个需向吴老请教的学术研究问题。

1987年秋,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也许是缘分使然,我又有机会遇到了吴老。这次相遇与上次不同,我从民族学博物馆出来,正赶着回家,因为当晚轮到我巡视学生晚自习。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是潘老师吗?我们一起走。”我回头一看,正是吴老。我返回几步,与吴老并行,心中不免一阵窃喜:和吴老交谈、学习的机会来了。

是年,吴老已是90岁的老人,走路好像更慢了一些,但步伐仍十分稳健。我向吴老汇报,说我已经在民院和华师发表4篇学术论文。吴老说,有悟性,有行动,就会有收获,你还要争取在民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当时我表示:一定抓紧时机,争取在学报上实现零突破。

我和吴老走到学生食堂路段时,我想,机会难得,于是向吴老又请教了三个问题:一是研究仅涉及全民族性课题,写学术论文时应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吴老肯定

地说，写全民族性课题可以向校外或者更高一级的刊物投稿，不过应注明作者工作单位。二是科研预测时，如何才能像您那样判断准确。在您的论文中，40年代就能准确判断七八十年代人类的身高。吴老说，你要深入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学》，掌握研究预测的方法，学会统计，学会计算。三是关于大的科研项目，现在工作忙，很难一次完成，您认为应如何处置。吴老很果断地说，教学和工作急用的课题，可先写先发表，不要被“五千字”所限，可用小课题、深研究、写精短论文面世，然后逐步扩充，最后成整体性项目论文面世。这三个问题讲完时，我们已经走到行政楼前。我对吴老说，我们以后路遇交谈的机会还有吗？吴老点点头说，还会有。

1991年秋，我终于在当年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民族乡镇综合发展规划的探讨》一文，7000多字。该文原是文、图、表具备，共万余字，经编辑部提示，删去了不少图表示例，但文中标题“民族”二字十分显眼，论文的内容和质量还不错。可惜的是，它面世晚了一步，吴老过世了，没有看到。

（三）

经过吴老的指导，我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结合教学开展学术活动，并在《江汉论坛》《企业秘书》《秘书世界》《秘书之友》等校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这些学术论文，有的获奖，有的编入文集出版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8月期《秘书工作》刊载了我的论文《谈经验的写作》。

《秘书工作》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全国性秘书业务指导类期刊，在秘书界

享有盛誉。之后，全国有8家刊物要求转载，有10多家出版社要求编入文集。这篇论文的缩写版最后由红旗出版社、龙门书局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成果选》第四卷收入。该文还被中国改革成果报编审委员会评为优秀改革理论成果，荣获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荣誉证书。

其实，《谈经验的写作》只是我研究经验课题的一部分，后来又进行了两次扩充：一是增加经验总结的内容，标题是《试谈经验总结与写作》，此文在国家教育部主管、华中师范大学主编的《语文教学与研究》发表；第二次扩充是经验的定义和源流，其标题是《论经验、经验总结与经验写作》，此文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发表。本想扩充第三个部分，即经验学习与推广，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研究项目的整体课题只完成了四分之三。这很对不起吴老，当然也对不起自己。

吴老在我们路遇交谈中的提示，给我以启示并产生了效果。当我把这些东西传授给学生后，学生也纷纷仿效。一位学生主动写了3篇改革方面的文稿，经指导后，有一篇在《湖北日报》发表，其余2篇在其他报刊发表。退休后，我应邀到一所民办高校任课，一位学生主动要求参加我指导毕业论文的写作小组。这些学生毕业时，都先后来到吴老铜像前鞠躬告别。

吴老，您真是一位令师生敬佩的师长。

（潘毓明：原中南民族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副院长）

当好“娘家人” 为妇女儿童代言

◇ 魏 静

2002年，我任汉阳区团委副书记时，有幸成为区政协最年轻的常委，从此便与人民政协结下了不解情缘。2005年，我在团市委工作时，又成为了市政协最年轻的委员；2011年，当选为市政协常委；2012年，成为省政协委员。期间因为工作调整，2013年我卸任了市政协常委，2016年到市妇联工作后，我再次成为市政协常委，共经历了三届市政协、两届省政协。可以说，我的政协经历伴随着我的青春与成长，从对参政议政的一知半解，逐渐成长为界别群众的代言人。在政协这个人才荟萃的大家庭中，我获益良多。

关注儿童就是关注城市的未来

从共青团到妇联，我的工作对象始终离不开儿童。因此，用好政协平台为儿童发

声，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几年来，围绕关爱困难儿童、开展婴幼儿托育工作、加强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和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等专题，我和界别的同志们持续开展调研，每年提交提案、建议和大会发言，利用一切机会反映诉求和建议，争取到了各方的重视和支持，也切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其中最打动我的有两件事。记得2011年，在市政协李传德副主席带领下，我们系统梳理了五类特殊困难儿童，按照一年重点调研和帮扶一类群体的目标，争取在一届中扎扎实实为困难儿童办点事。第一年锁定的对象是服刑在教人员子女，李传德副主席带着我们一手抓家访，深入社区和家庭了解困难和需求；一手抓落实，针对共性问题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协商分工解决。针对个性问题，他带着我们亲自上门找区领导解决。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工作靠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可

惜的是第二年我转岗离开了，不能跟着李传德副主席把五类困难儿童群体帮扶工作全部做完。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关于0~3岁婴幼儿托幼工作。市妇联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做了一次深入调研，发现妈妈们普遍反映孩子生了没人带的问题，因而不敢生不想生。因此，我持续提交了建立学龄前服务关爱体系、开展托幼服务等提案。这些提案得到了市政协陈光菊副主席的高度重视，她以一个老妇联工作者的职业敏感和一位妈妈的情怀，亲自带领我们开展调研，整合资源，争取各方重视和支持，还不辞辛苦到先进地区学习取经，最终促成了全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意见的出台，把提案扎扎实实落实成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在她身上，我学到了带着真情实感为工作对象做好服务的工作态度。

在2020年的市政协全会上，我代表妇联界别作了争创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大会发

言。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心儿童的城市是有希望的城市，关注儿童的城市是有梦想的城市，关爱儿童的城市是有温度的城市，愿我们的城市和儿童一起茁壮成长，更加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是我的心里话，我相信通过政协平台持续为儿童发声呼吁，武汉的妈妈和孩子们的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

姐妹的事儿放心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甚至有人说女人的地位已经超过男人了。其实，因为女性生理、心理上的一些特殊性，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还是处于弱势，有一些羞于倾诉的烦恼无处解决。作为妇联人，我时刻关注并为姐妹们代言。在这里讲两件提案背后的故事。

2015年的一个周末，我陪父母去一个

景点玩，在卫生间门口，有一位外地来汉游玩的母亲抱着孩子焦急地寻找着什么。我母亲主动问她有没有要帮忙的，她说要给孩子喂奶找不到母婴室。情急之下，我们用伞遮着让她给孩子喂了奶。这件事触动了我，我给父母交了一个任务，请他们用闲暇时间把武汉的几个火车站、地铁中转站和旅游景点转一



2019年1月，魏静委员在政协会上为妇女儿童发声

遍，看看母婴室的情况。结果果然不乐观，有的是有但没开门，有的开了门但堆满杂物，还有的压根就没有。依据调研的结果，我连续两年向省、市政协提交了加大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的提案，还争取市妇联主席支持，在妇联一楼率先建了一个母婴室，方便前来咨询求助的妈妈们的。这件提案得到了省、市卫健委的高度重视，落实力度非常大，不仅出台了相关文件和检查考核办法，而且还纳入了文明创建的考评体系。我再让父母去“暗访”时，他们说果然改善了很多，政协提案确实有作用。

2017年，市妇联维权咨询服务中心收到一封女大学生的来信，反映在地铁上受到性骚扰，建议妇联做一些工作。我们第一时间与地铁集团进行了沟通，同时也向市政协递交了在公共交通中反性骚扰的建议。地铁集团和公交集团作为提案会办单位高度重视，开展了对驾驶员和执法巡查队有关性骚扰的培训和应急处置，同时加大了反性骚扰的宣传力度，联合妇联开展了全市首次“防治公共交通性骚扰”宣传活动，鼓励姐妹们在遇到性骚扰时大胆维权。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市妇联成立了指挥部，我分管服务组，每天收到大量的网络求助，其中有很多是反映女性特殊困难的，有孕妇找不到孕检医院的，有感染了新冠无处生产的，有全家感染了孩子无人托付的，有医护人员反映孕期哺乳期保护的等等。我们一方面联系资源及时解决，一方面收集整理相关信息后向政府和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请求在更高平台得到帮助和解决。我始终秉承一个信念：姐妹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一定要放在心坎上。

委员们常说：“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缘。”对此，我深有体会。在政协这

个大家庭中，我不仅自身得到丰富和提高，更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友情和亲情。2011年我生病住院，在我最一筹莫展之际，我在政协认识的陈汉平教授（她也是数届的市政协老委员）向我伸出了援手。她像妈妈一样地安慰我、照顾我，为我找医生，安排病床，鼓励我坚持治疗，战胜病魔。现在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常来常往。2018年，市政协安排我们与新疆、西藏班的孩子结对认亲，妇联界别的妈妈们十分踊跃，我也结对了一个新疆儿子，跟我儿子同龄。在我们界别的微信朋友圈，大家都成了“晒娃控”，经常秀一秀自己的新疆、西藏儿子、女儿的照片。2019年暑期，新疆儿子回去过暑假，期间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想我想武汉了，让我霎那间泪目。这些因为政协而结缘的美好与感动，相信会伴我终身。

（魏静：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妇联副主席）

新媒体就是我的抗疫阵地

◇ 冯伟华

“阳逻在线”开启我的自媒体之路

2000年，我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在武汉市蔡甸区一个机关单位上班。那时国内互联网刚刚兴起，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互联网行业充满着憧憬与热爱。2001年，我从单位辞职，成为南漂北漂一族。

2003年，“非典”爆发。当时我在深圳工作，街上突然就空空荡荡了，自己心里顿时也紧张起来。期间我有一次感冒，导致咳嗽加高烧，赶紧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普通感冒，算是虚惊一场。疫情结束后，由于父母的再三要求，我于2004年初回到了武汉。当年2月，武汉阳逻国际集装箱转运中心开港营运。也是那一年，我又去了北京。当时北京“非典”疫情防控还未放松，五道口商场进出还要测量体温。随后我在北京新东方工作，一晃就是8年，见证了新东方教育集团的海外上市和发展壮大。

在新东方从事网络编辑工作之余，2006

年我为家乡阳逻创建了社区论坛“阳逻在线”。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在上面发帖，慢慢地论坛上论坛交流的网友越来越多，10多年的时间，“阳逻在线”已成为新洲区创办最早且能坚持下来的社区论坛。现在我在论坛上翻看10多年前网友的留言、照片，曾经的我们都已步入中年，阳逻也由一个江边小镇成为一个港口新城，不由感叹时光流逝。

随着孩子出生，2012年，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开始自己创业，于2014年成立了武汉市新港互联科技有限公司。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陆续创办了“阳逻在线”“今日新洲”“长江新城论坛”“新洲招聘”“新洲吃喝玩乐”等微信公众号，关注新洲经济发展，反映百姓呼声，分享本地消费体验，受到网友的喜欢和支持。目前，订阅粉丝总人数有20多万人，有1/5的新洲人关注订阅，成为新洲区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

2016年12月22日，对我来说是又一个重要的日子。作为新媒体行业的代表，我成为新洲区政协委员，并当选为区政协常

委。从此，我有机会借助政协平台发挥优势参政议政，更好地运用好新媒体工具，深入调查研究，反映民生诉求，积极建言献策。

建言献策助抗疫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汹涌而来，一场与生命赛跑、与疫情抗争的阻击战在武汉打响。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一位新媒体从业者，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尽自己的责任，为疫情防控做一点事情。

疫情一开始，我立即想到自己运营的“阳逻在线”和“今日新洲”等微信公众号，应该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助力武汉抗疫。我马上行动起来，利用新媒体平台在信息公开、物资捐赠、社会服务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1月底，很多新洲网友对新冠病毒警觉性不高，我向阳逻街政协联络委建议，公开社区疫情信息。此举不仅可以帮助居民及时了解身边的疫情，提高大家的警觉性和防范意识，更有利于社区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防控，遏制疫情扩散蔓延。阳逻街迅即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汇报，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各社区、村委会每日发布疫情通告，在社区群里向居民公开，但受众面不广。于是，我每天联系各社区工作人员，收集整理当天的社区疫情通告，通过“阳逻在线”和“今日新洲”及时发布；与此同时，我还每天跟踪报道各社区的疫情防控动态、社区志愿者中的好人好事，为新洲区疫情防控工作传播正能量。志愿者人手不足，我就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动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增加生力军。

武汉加强社区、小区、村镇封闭管理后，很多居民封闭在家，不知道如何购买生活物

资，重病患者不知道如何就医出行。了解到这一情况，我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生活物资采购信息、相关公司的客服电话等，微信后台每天成了网友咨询热线，我带领编辑团队都耐心解答，最多时一天回复100多个网友的咨询。

由于居民对社区、村委会的情况不了解，我又向阳逻街政协联络委建议阳逻街公开各社区、村委会联系方式，便于居民电话求助，同时给阳逻本地的京东快递电动车发放通行证，为居民提供更多团购渠道选择，通过市场竞争稳定物价。阳逻街疫情防控指挥部采纳了这些建议，通过各新媒体平台公布了《阳逻街各村、社区负责人及驻点国家干部联系方式》，广大居民找到了主心骨，咨询方式公开透明了，阳逻街居民生活物资购买难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解决。

爱心接力助抗疫

疫情期间，无论是医疗救护还是群众生活，都需要大量物资保障，做好爱心捐赠工作非常重要。我通过新媒体平台转发政府部门和医院的接受社会爱心捐赠公告，并积极报道社会各界的爱心行动，倡议网友为新洲区抗疫一线捐款捐物。

经过我的沟通联系，深圳富达会的湖北老乡为新洲区文明爱心公益协会捐赠了1万只口罩，鲜达令等企业和双柳一些菜农为阳逻中山医院、福利院、社区困难群众捐赠了爱心蔬菜，劲牌公司为阳逻地区医院、社区捐赠了7200多副中药配方预防用药和100件王老吉饮料，还有爱心商家为阳逻街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了消毒酒精和防护用品等。

困难群众的生活尤其令人牵挂。春节

期间，赶在武汉封城前，我带领公司团队为阳逻江边的残疾孤寡老人周旺发送去米油、面包等生活物资。周旺发来自汉川农村，今年79岁，在阳逻已生活了20多年。他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萎缩，右脚只剩两只脚趾头，左脚趾全都没了，终生残疾。岁月不饶人，老人家现在很少外出乞讨，但经常有好心人给他送生活物资。他住的江边老房子，也是好心人免费提供给他住的。武汉解封后，我看到阳逻江北社区的工作简讯，里面有社区志愿者在疫情期间看望周爹爹的图片，给他送去生活物资和防疫用品，内心很感动，正是有这些默默无闻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才让那些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平安度过此次疫情。

疫情期间，有网友向“阳逻在线”求助：阳逻街汽渡社区花山小区姊妹程周婧（9岁）、程周洋（17岁）2019年因父亲癌症去世、母亲失踪成了孤儿，疫情期间生活困难。4月8日离汉通道解封后，我为两姊妹捐款3000元，委托新洲区文明爱心公益协会匿名捐赠给她们，并为她俩送去了书包、衣服，帮她们暂时渡过难关。“阳逻在线”全程参与报道此事。很多网友看到“阳逻在线”的新闻报道，又纷纷通过区文明爱心公益协会为两姊妹捐款献爱心。

让真相跑赢谣言

疫情期间引导网民支持各级政府的防控举措，相信科学的防控方法，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有一次，一段反映一位志愿者在阳逻将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送给自己亲戚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并迅速发酵。网友为此责怪政府对受捐蔬菜管理失职。我发现后，第一

时间联系新洲区网信办，建议政府部门组织调查并公布真相。

经过核查，新洲汪集人罗某，自行在网上联系爱心人士捐赠了一批蔬菜，用车从成都运回并沿途发放。2月23日途经阳逻时，他的亲戚领取了4袋蔬菜分给左右邻居，并拍摄视频在朋友圈发布，约朋友来领爱心菜。罗某事后将车辆开到麻城市，继续发放所载蔬菜。在蔬菜受捐和发放过程中，并无阳逻街道办事处公职人员和所聘志愿者参与。同时，街道也加强了对受捐物资领取和发放管理，维持正常捐受秩序。

当天傍晚，新洲区网信办通过“阳逻在线”微信平台首先发布《关于阳逻涉捐赠蔬菜有关情况的说明》。晚上，新华网、《环球时报》《湖北日报》和武汉发布等各大官媒也及时转发“阳逻在线”的文章进行辟谣，阻止了谣言的扩散。

还有一次，有网友反映“最近米要涨价”的谣言流传，新洲区有村民拖了一板车米存在家里，希望“阳逻在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我向新洲区网信办汇报后，及时转发国家、省、市媒体的权威发声，通过新媒体平台及时辟谣，呼吁网友不要抢购囤积大米，获得网友点赞，并受到区委宣传部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和新媒体从业者，我用文字书写新洲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忠诚、执着与坚守；用相机记录新洲阻击疫情的点滴瞬间，记录社区居民同心抗疫的风采。我将继续坚守新媒体阵地，同时结合本职做好政协工作，履行委员职责，发出政协好声音、传递正能量。

（冯伟华：新洲区政协常委、新洲区新联会副会长）

直升飞机“直投”捐赠 只为物资最快抵达

◇ 黄 睿

6月的武汉，暑热蒸腾。驱车穿行街巷，路边熙攘、人声鼎沸，依然江城味道。车过新华路体育场——这座落成超过一甲子、见证武汉发展变化的庞大建筑，作为一个武汉伢，从小到大我无数次从这里经过，可今天竟不觉眼眶润湿。

时间仿佛回到那一天。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危急、物资最匮乏之际，当一架AW109直升飞机飞行135公里从仙桃顺利抵汉，它装载的2000套医用防护服，代表了我和我们武汉文化创新产业促进会（以下简称“武汉文创会”）最坚强的抗击疫情的决心，也给了风暴中心绝望的人们最大的温暖和慰藉。而见证这种信念、承接这份温暖的，正是新华路体育场。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阶段，我们率先打通民间捐赠的绿色通道，率先破解捐赠物资仓储、转运难题，率先调用直升飞机“直投”捐赠医疗物资。耳边似乎又响起直

升机的轰鸣，划破阴沉的江城天空，带来一道光、一份希望。

不妨就再回到那一天，纵然早已云开雾散、明媚如初，那些艰难中的奋进、困顿中的温情、不远万里的相助……早已汇聚成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珍藏，也是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历程中虽小却深沉的历史镌刻。

物资，物资！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汹汹来袭，拦住了人们回家过年的脚步，打碎了阖家团圆的美好。一场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役全面打响。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九省通衢之地以封城之举，保全国家。

此时，已有四位高龄亲友高烧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我，正带着两个孩子封闭在家。我们武汉文创会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委员会主任、海外投资公司总经理傅壹刚刚乘飞机离开武汉，到泰国考察。武汉文创会的徐杨、刘思思也和大部分武汉人一样响应号召，备足粮食，足不出户。

我们四人所在位置不同、各自情况也不一样，却不约而同想一件事：疫情当前，兵临城下，武汉需要我做什么？我能为这座城市做什么？

物资！还是物资！

当时正是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各类物资、尤其医疗物资最为紧缺的时候。傅壹的弟弟是武汉某医院ICU医生，深知医疗系统物资匮乏的危急程度。傅壹第一时间辗转买到9万个医用口罩、4000件防护服，23日晚派人送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新华医院和省人民医院。

依然杯水车薪。然而，正处于春节假期的中国，即便很多医疗物资生产厂家已经紧急召回员工，开足马力生产，也难以第一时间缓解燃眉之急。海外采购和捐赠，成为首选。

武汉文创会多家合作企业的海外分公司、贸易公司，许许多多海外华人华侨，都主动联系采买、捐赠事宜。每天各种信息潮水般涌向我们几个人的微信、短信、电话，表达着对祖国、家乡的担忧与关切，表达着倾囊相助的急迫。

武汉文创会秘书长、武汉市开悟明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杨还记得：“从1月22日起，关于海外捐赠一下子建立了20个

微信群，海外捐赠群按国别取名，每一个都很快‘爆棚’。”到了24日，武汉文创会的另一位秘书长刘思思也加入进来，协助管理海外捐赠群。“但消息还是太多了，手机内存爆满。”徐杨又买了一部手机，“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就是为了及时准确地把群里的信息消化，把捐赠的物资落实，真正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那些日子真是忙得不分昼夜，也不知疲倦，身体里好像装了一台永动机，催着我们不停地交流信息、沟通联络。因为城市封闭，我们不能出门，所有工作都靠手机。我们几个都是满含着热泪回复、沟通捐赠信息的。“在短短一两天里，武汉文创会收到的海外捐赠意向，仅口罩一项就达到500万个。但那时海外捐赠绿色通道尚未开启，海外捐赠需经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同意，会同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函，经海关总署才能入关、接收，否则，这些捐赠物资只能走贸易通道。”

一边是防控疫情所需医疗物资的巨大缺口，一边是拳拳赤子之心。打通民间捐赠的绿色通道成为当务之急。

按照我国法律法规，海外物资捐赠，必须经过省级慈善机构接收，之后再统一调配。此次疫情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和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指定的受捐机构。但当时，这些机构在开放接收海外医疗物资捐赠方面又面临实际困难。因为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必须得到国家专业机构认证，确认符合我国国家医疗标准的医疗产品才可用于医疗体系，而当时海外捐赠物资，基本都是他国医疗标准，短时间内也难以取得我国国家认证。因此，只能民用，不能医用。

有人告诉我，有的医疗产品光认证流

程就需要两三个月。我真的急了。疫情当前，医疗系统的物资极度匮乏。没有装备，医务人员就相当于在病毒面前“裸奔”。

无论如何也要打开民间捐赠的海外通道。

我们决心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月24日下午3点，我们和海关总署进行了沟通。期间，武汉海关关税处主动为我们协调，科长找处长，处长找关长，同时向总署汇报。次日一早，我们又对接了省红十字会，沟通海外捐赠物资入关的问题，当看到我们出示的各国华人发来的信息内容和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急需大量物资求助的各类信息时，一位科长急哭了。

最终，我们先后联系外交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商务部、湖北省防疫指挥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北京海关、上海海关、深圳海关、广州海关、长沙海关、西安海关、武汉海关、武汉市防疫指挥部、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武汉市应急管理局、武汉市商务局、武汉市民政局、江汉区妇女联合会、青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江汉区防疫指挥部、青山区防疫指挥部、汉阳区防疫指挥部，以及省内各地市州县的一二十个防疫指挥部……今天回看这长长的名单，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的我们有这般勇气，在短短48小时内不眠不休地联络了这么多国家部委、省市机构。



2020年2月1日，武汉文创会申请的直升飞机降落新华路体育场，为武汉协和医院送来急需的医疗物资

经协调，1月25日，武汉文创会拿到海关总署下发的第一份批准文件，民间捐赠物资绿色通道就此打开。

没过两天，第一批海外捐赠物资顺利进关，海关同志迅速开展检疫工作，加急办理，当天清关出关，我们的志愿者车队立即提货，分送到一线各医院。此后，海外捐赠物资陆续抵达武汉，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初期湖北各地，尤其武汉市各定点医院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

空运，空运！

时间来到1月底，疫情最吃紧的时候。因为湖北全省地面交通管制，各地市之间地面物资运输也有严格管控要求。在此情况下，1月30日，我们又作出一个决定：空运医疗物资。

飞机运输，当然能解燃眉之急，但对于我们来说，从来没有操作过这样的事情，找谁？哪个部门主管？两个问题好像两座

大山摆在面前，我们一片茫然。经过半个小时线上会议，我们决定分头联系，尽快解决困难。

我们四人先向各自所在的区防疫指挥部打申请。指挥部回复很快，但此事不在他们管辖范围，建议联系交通部门。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联系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领导看到申请后，回复飞行管理也不在其管理范围内，但本着疫情期间特事特办的原则，市交通运输局经过先期沟通，建议我们向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申请。

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把飞行申请送到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经过市防疫指挥部有关领导的询问和确认相关信息，认为我们作为民间团体申请飞机运送防疫物资尚数首例，属于应急救援工作范畴，建议向武汉市应急管理局发出申请。

终于明确了方向。

联系到武汉市应急管理局时，已是1月31日晚上近8点钟了，我们心急如焚。让我们心里得到安慰的是，市应急管理局的郑文华大姐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马上四处联系。时间滴滴答答地过去，快晚上9点了，我们终于得到了明确回复，需要重新写一份合适的申请传真过去。

立刻行动。徐杨起草，我审核盖章，刘思思传真。

关键时刻，武汉文创会秘书处的传真机坏了！徐杨一看，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就跑，准备到自己公司发传真。我们同时在文创会的微信群和自己的朋友圈里“紧急呼叫”，请可以发传真的会员和朋友帮忙。疫情期间，大家几乎都不在岗，只能干着急，没人帮得上忙。等徐杨心急火燎赶到公司，打开设备，发现也出现故障了。

一筹莫展之际，刘思思收到信息，她

的一位在武昌区政府工作的邻居看到她在朋友圈发的求助信息，赶紧回复，接下了此事。这位热心人骑着自行车赶回单位，当天晚上9点多，我们的飞行申请传真终于发出去了。

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一边静等第二天早上市应急管理局的批复，一边继续跟全球各地捐赠团体进行沟通。

2月1日早上8点，刚到工作时间，徐杨就继续跟进。终于，我们得到了首飞的批准。

就这样，在48小时里，我们昼夜不舍四处联系，共递交了8份申请，让我们的救援物资坐上飞机奔赴前沿阵地。

2020年2月1日，武汉封城第9天。

我们第一架空运防疫医疗物资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天气状况怎样？能顺利起飞吗？能安全抵达么？……无数个担心在我心里争先恐后地翻涌，按下了这个又冒出那个。

我紧紧盯着时间，下午3点到了！我知道，一架AW109直升飞机此时即将从仙桃起飞。我看着身边的刘思思、徐杨，我们都没有说话，对视的眼神中是只有彼此懂得的坚定。

我知道，此行一定成功！

经过135公里飞行，下午5点，直升飞机顺利抵达武汉，最终安全降落新华路体育场。在医疗物资最为匮乏的时候，飞机上装载的2000套医用防护服无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救命物资。

当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在空中响起时，我哭了，身边的刘思思、徐杨哭了，远在海外的傅壹对着手机屏幕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现场还有很多看到飞机降落的群众，大家都都哭了。我看到他们敲着脸盆、哭着喊着，看到很多人都在拿手机拍，用的最多的

词是“泪目”，好像抓住了生的希望。

是啊，这就是生的希望！

天色将暮，直升飞机平稳落地，看着医疗物资一箱箱被搬下，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在往武汉协和医院运送物资之后，第三天直升机又飞到疫情较重的黄冈、鄂州、孝感运送物资。医生护士们看到空运的物资难忍泪水，直说有希望了！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借来直升飞机运送紧急物资，可是我们做到了。

武汉文创会也由此成为抗击疫情期间最早且唯一动用民间直升机转运物资的社会团体。

此间不易，一切值得。

快速响应，精准无误

我们做到的又何止“借飞机”。1月底，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吃紧，在海外捐赠物资涌向中国海关之际，国内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行动，很多地方的企业、单位、个人通过武汉文创会捐赠物资，从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酒精到方便面、矿泉水，甚至牛羊肉……我们面对物资无处储存、转运不便、分发不畅三大难题，在武汉文创会所有103名会员和身边亲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完美化解了所有难题。

2月初，仓库很难找，一开始联系的仓

库没几天就满了，很多民用仓库又缺乏管理系统。为了使捐赠物资明晰、拨付账目公开透明，我们几经联系，找到武钢集团公司。他们在自身仓库紧张的情况下，为武汉文创会腾出了一间2万平方米的江北仓库和一套库管系统，并配备了工作人员。

有一天卸完货已是深夜，工人师傅都还饿着，当时仓库有自热饭和饼干，我们让工人拿了4份自热饭和几瓶水充饥。第二天，江北仓库的领导听说我们送给工人师傅饭和水，坚持要求补齐。他们说，这些物资是送给医护人员的，他们万万不能动。

一贯坚强如我，那一刻又不禁热泪盈眶。

在这样的精准管理下，疫情期间，武汉文创会接收的捐赠物资账目清晰、无一差错，连一瓶矿泉水的去处都有迹可循。

此后，武汉文创会运送检测试剂、防疫物资共计13批次，做了近百份报告。那时疫情尚未迎来拐点，物资持续匮乏，医护人员都在发消息求助，我们只有顶着压力上，也必须得顶得住。



2018年1月，武汉文创会黄睿会长列席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比起飞机给当时武汉乃至全国人民带来的震撼，用私家车、甚至豪车运送医用物资的志愿者同样令人刮目相看。这群常常被人打上“富二代”标签的“80后”“90后”们，在这次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快速成长，成为运送、分发捐赠物资的主力军，为捐赠物资快速抵达指定地点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1月27日，海外第一批免税物资运抵武汉，所有物资均需当天分配。当时因为交通等原因，这些物资抵达武汉是夜里11点至次日凌晨2点间，然后在现场分发，直接送到指定医院。是夜，当傅壹看着从四面八方赶来运送物资的200多台志愿车辆，感慨万千：“这些平日里看上去像孩子一样的青年，开着自己的豪车，不怕危险、不顾疲倦地深夜赶来，就为捐赠物资快一点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经常是凌晨捐赠物资才到武汉，清晨六七点，我们已经把它们分送到100多家医院了。”

50多天时间里，我和傅壹、徐杨、刘思思每天工作超过20个小时，通过微信连接了100多个海外捐助群，捐赠物资来源几乎遍布全球各地。我是武汉伢，我们都是武汉人，家乡危急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拼尽全力。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的紧张日程背后，是我们武汉文创会人分秒必争驰援抗击疫情前线的坚定信念、快速响应和实际行动，是我们甘愿爱心传递、守卫平安的赤子之心，是我们面对风险的无私无畏、勇于担当。

2020年3月18日0~24时，武汉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均无新增，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首次出现“双零”。

4月8日零时，封城76天的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江城回暖，武汉重生。这座被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按下“暂停键”百余天的九省通衢之地，迅速而有序地回归原本的喧嚣与沸腾。

时隔三个多月，我和傅壹、徐杨、刘思思四人再次相聚，总结盘点。坐望长江，有风徐来，往日的寻常风景，而今却格外美好动人。

回望1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和身边、身后的小伙伴们、志愿者们，不舍昼夜接力奋进。截至4月21日，武汉文创会共发动、组织、带领、调配了36辆卡车，13架次直升飞机，累计收到海内外捐款人民币165103236.6元；毫无差错地将来自海内外50多个爱心机构、单位、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以最快速度运送到战疫一线，保障了急需物资的医院、社区服务中心、政府部门、公安、环卫等总计400多个点位的供给。

这是一次因防控疫情而缘起的爱的接力，更是家园危难之际民族力量的强大汇聚。在一个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背后，是千千万万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而拼命的身影。这身影中，有我。

（黄睿：武汉文化创新产业促进会创始会长，列席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二次、四次会议）

看图有师赵学田

◇ 林道生

在寸土寸金的武汉光谷广场一隅，有一块绿地令人肃静，这里是湖北科技名人雕塑园。和风吹过，花草频频向行人招手，好像在说，我们簇拥的湖北古今科技英杰，有毕昇、李时珍、李四光、涂长望等，你认识吗？在这群塑像间，有一位身穿中山服的老人，银发被岁月梳得稀疏，面容被绘笔描得清瘦，目光被宏图照得明亮。他坐在沙发上，膝上铺着蓝图，心存愿景，期待手指落处的机械，变成大国重器。他就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工程图学专家和科普作家赵学田。

赵学田（1900～2000年），湖北省巴东县人。2020年是这位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创始人、科普泰斗诞辰120周年。

赵学田出身在书香之家，自幼天资聪慧，喜爱画图，崇尚审美，成绩优异。1917年，他考入位于武昌的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

赵学田声援五四运动，参加了武汉进步学生组织的游行示威。他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迷信观念。中学毕业后，赵学田抱着“工业救国”的志向来到北平，于1920年考入北平工业专门学校。

旧中国积贫积弱，机械工业落后，即使有几家官办企业，也都被洋人掌控技术，用来制造枪炮，供应军阀混战。赵学田胸怀壮志，沉下身子刻苦学习，终年在校办工厂向师傅求教，操作车、铣、刨、镗……机床飞转，钢屑狂舞，旦复旦兮，终于练得一手好技艺。1924年，他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后当过兵工厂管理，任过电器厂技师，做过洋行绘图员。正当他施展制图才艺时，却遭到洋人歧视、排挤。赵学田不愿当洋奴，愤而离开这“冒险者的乐园”。

他回到家乡湖北，曾任汉口无线电台台长，薪酬不菲，但专业却不对口。1935年，赵学田幸遇贵人，经武汉大学机械系郭霖主任推荐，他任该系讲师兼实习工厂主管，从此得以施展才艺。赵学田在武汉大学教授机械制图，实例剖析，要点难点，讲解详尽；他管理工厂，驾轻就熟，精明干练，运筹周密，受到师生与职工们的好评。1938年，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赵学田负责实习工厂机器设备的转移，数千里行程，山重水复，敌机轰炸，险阻层出不穷。由于他计划有方，转移工作有条不紊，安全到达目的地后，即安装投产军需用品，供抗战前线的急需。1939年，他因为工作出色受到校长王星拱的称赞。1943年，冯玉祥将军来厂参观后说：“一个学校的实习工厂，既培养人才，

又出产品，实为少见。”由于赵学田教学、管厂可圈可点，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经济建设极为重视，在高校院系调整中，为培养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于1952年新建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随武大工学院，来这所新院校任制图教研室主任。在这个工程师的摇篮，他着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建设项目，着力培养懂设计、会制图的青年学子。

赵学田到过许多工厂，他看到许多工人由农村招来，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不会看机械图纸，生产出的产品废品率很高。怎样教工人看懂机械图纸？这成了赵学田的一个心结。

1954年2月，他来到武昌造船厂，对二、三级技工进行教学实践，将大学100学时的课，浓缩成20学时教完。其中，投影几何是最大难点。过去，学校里老师怕教、学生怕学。为此，他结合生产实践，运用实物范例讲投影，生动形象，让技工们找到了识图的窍门。赵学田授课十分成功，获得了工人们赠送的一面锦旗——“感谢您授给我们找窍门的金钥匙”。1954年4月23日，《长江日报》报道了赵学田到工厂下车间教工人学看机械图纸的事迹后，立即有200多家工厂、技校和培训部门，热情邀请赵学田去授课。

讲授机械看图，必须开卷有益。为了做好教学推广，他开始编写教材。寒来暑往，选图配文。1955年，赵学田写成了《机械工人速成看图》一书，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书一问世，就以标准规范的图例，深入浅出的讲解，形象生动的剖析，喜闻乐见的口诀，受到机械工人的欢迎。当年此书几乎人手一册，“看图有师赵学田”，成了青工



1955年出版的《机械工人速成看图》(赵学田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馆藏)

的口头禅。工人识得了机械图纸，产品合格率大大提升，废品得以减少，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后来，《机械工人速成看图》再版19次，发行1600万册，创下科普书发行纪录，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为此还拍摄了科教影片。

1969年，我在武汉市通用机械公司工模夹具厂第一次上班。钳工组长给我一本油腻腻、有些残破、不知被

多少人看过的书，就是《机械工人速成看图》。他说：“青工多，师傅少，都无专人带，边学边干吧，此书对你做活有帮助，有什么不懂的问我。”星期天，我去书店买了一本新书，就把旧书还给他。组长还以为我不想干了，当看到写有我名字的新书时，他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此，这本书陪伴了我十年。后来，我还给自己带的徒弟看，成了学习看书的“传家宝”。

美国作家戴维斯曾说：“好作品的秘密在于用新的方式叙述一件旧事，或用一种旧的方式叙述一件新事。”赵学田的书，我以为两种方式都用了，他用投影几何的方式，剖析最常见的图例，建构了立体图的概念，鲜活生趣，一目了然。他用口诀记忆的方式，总结平面图与立体图对照，归纳“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九字诀，简明扼要，易学好记。他为机械工人看图扫盲，功莫大矣！

1956年，赵学田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他还当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赵学田时亲



1983年，《长江日报》科学与卫生专刊责任编辑林道生在编辑部留影

切地问道：“你是在为工人写书吗？”他激动地说：“是。”这是领袖的鼓励与鞭策。赵学田再接再厉，又写了《机械制图自学读本》，受到工人师傅、技术人员的好评，被誉为开启制图智慧的“金钥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普工作也提上日程。此前的1975年，我曾应科学出版社之邀，参加了高士其的《菌儿自传》评阅工作，从此热爱上科普创作。1978年，我调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后，任科普专刊编辑。1979年，湖北省科普座谈会召开，我出席了这次会议，见到在书中教我看图的老师兴奋不已。八十高龄的赵老，身材精悍，面容和善，目光矍铄，精力充沛。他时任中国工程图学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科协副主席，还在为科普事业而忙碌，同与会代表同桌就餐，探讨科技传播、提高公民素质的大计。

我在座谈会期间，向赵学田教授请教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图形语言的特征？他

说，图形语言为表象符号，与自然语言（文字语言）不同，它形象、直观，具有国际化、无需翻译等特点，如机械图天下共识。我又问到：学习机械制图要具备什么素质？他说，其一，制图者要有科学头脑，对机械科学原理、技术方案成竹于胸，运用自如，才能绘出合格有用的图纸；其二，制图者要有敬业精神，尚志明德，具有职业操守，从善如流，倾听客户意见，工作严谨认真；其三，制图者要有艺术眼光，懂得审美，如结构美、和谐美、组合美等，绘出的图干净美观。制图者要将科学之真、敬业之善和艺术之美融合，提升自己的基本素质。

赵学田教授还寄语莘莘学子：你们是未来的机械工程师，古人说“贵在虚静”，只有虚怀若谷、宁静致远，才能练得一手制图好功夫。我继续问到，机械制图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说，现在图纸用氨水熏制，气味刺鼻，图纸也欠清晰，国外已用计算机绘图，点击鼠标，线条粗细可调，画错易擦，用打印机出图，清晰美观。绘制三维动态图形，可多视角观看与修改。听赵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

莎士比亚说：“所有人生命里都有一部历史。”赵老历经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他看到，旧社会的机械作坊，师傅仅凭规、尺量测，就能仿制出一件产品，手艺高超。但是无图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凡器用之属，非图无以制器。”宋朝历史学家郑樵的名言，道明了图纸在制造业的重要作用，靠依葫芦画瓢加工，作坊经济永远长不大。机械制造为工业之母，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台水能机，都要按图纸生产，图纸上有尺寸、精度等要求，它体现了工业生产乃至工作制度的规范，如果达不到要求，做成次品、废品，制造者要承担责任。当年，赵

学田看到许多工人不会看图，才决定写书做科普，实现他的心愿，报效祖国。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赵学田著书十分严谨、认真，容不得一丝瑕疵。1980年，他的《自学看图入门》被推荐参加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奖。因书中有两处刊误，赵学田不同意参评，把评奖机会留给他人，让科普界人士深感钦佩。古人曰：“道生于安静，德生于卑退，福生于清俭，命生于和畅。”我以为，尚道崇德、清俭和畅是赵学田人生的缩影，他福寿圆满，成为后人景仰的科普泰斗。

我与赵学田还有一信之缘。1983年，时逢《长江日报》科学与卫生专刊出版100期，我去信请赵学田教授题词，只几天，便收到了回函。他用清秀的字体写道：“副刊一百期，宗旨为普及，更上一层楼，科学化奇迹。”赵学田教授的题词，体现了他对科普事业的关心，对我既是鞭策、鼓励，也是指导、关爱。我思索，怎样将科技转化为奇迹？赵学田教授可称典范。他无论是授课、写科普书，还是制图、操作示范，都是本着“宗旨为普及”的初心，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让中国制造借科技之力，化成经济奇迹光耀世界。

（林道生：科普作家，曾任《长江日报》主任编辑）

我拍我写“半截桥”

◇ 王东升

2015年7月，位于武汉市新洲区政府所在地邾城街外的举水河老大桥连接工程竣工，两岸群众过“半截桥”后再涉水摆渡终成历史。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晚霞映照，我和朋友刘建桥相约来看半截老桥变新桥。漫步在大桥上，看着悠然的人群，我们百感交集。这里少了往年涉水人的大呼小叫、少了摆渡机船的隆隆声，少了“半截桥”的缺憾，多了长虹卧波，多了安宁祥和。刘建桥说，当年父母就是以这桥来给他取名，这其中有自豪、有喜悦、也有期盼。如今，桥通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很圆满了。那些和他一样取名为“新桥”“友桥”“贵桥”“爱桥”“桥生”的人，都已经年过半百，肯定也有与他相同的感受。徜徉在大桥上，联想起7年前，我拍的“半截桥”摄影作品不仅进京参展，

还意外推动了“半截桥”连接工程，我的心情无比畅快。

（一）

关于新洲的“半截桥”，2014年2月出版的《邾城街志》有以下记载：1951年11月，新洲县城西的举水河大桥经申报批准兴建，计划投资100万元，由省公路局工程队承建，县政府安排940名民工配合施工，于12月正式开工，采取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办法，到1960年末，仅完成2个桥台，10个桥墩。因资金困难，工程进展缓慢，于1962年2月奉命停建，共耗资82.3万元。1966年10月，再次开工续建，于1967年5月建成宽7米、长214米的半截桥，桥西留下400米长的低漫水道。每年

夏季，举水河稍有涨水，低漫水道即被淹没，“半截桥”架空无用。

由于当年资金难以为继，大桥只修了半截，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拖就是半个多世纪。

我是喝着举水河河水长大的土生土长的新洲人，从小在举水河边嬉戏，对母亲河有着特别的感情。记得那时我在邾城街城建服务中心工作，同时还兼任《长江日报》的通讯员。

工作之余，我是一名摄影“发烧友”，每年的防汛是我拍摄的必选题。2008年夏，我不经意间把举水河上的“半截桥”纳入了镜头。当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台、首都博物馆、新浪网联合举办“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专题——我们的共同记忆”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征稿。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灵机一动，为自己拍摄的“半截桥”照片配写了文字，以《武汉新洲举水河半截桥的自白》为题，投稿到了活动组委会。我只是想，这算是偶尔为之的趣事吧。没想到这幅作品竟然入选了，不仅被举办方展出，而且还被收藏了。

直到今天，只要在百度输入“武汉新洲举水河半截桥的自白”，还可以看到原始的“图片故事”——

具有200多万年历史的举水，一直哺育和滋养着一河两岸的90余万新洲儿女，因而被广受恩泽的子民们尊称为“母亲河”。曾因我在1967年5月的诞生，而结束了人们舟楫劳累和走独木桥的胆颤心惊。

在困难时期，人们为我倾其所有，我



2008年，王东升的摄影作品《武汉新洲举水河半截桥的自白》

也成为大家的自豪，我承载着人们的无限憧憬，也记录着人们前进的匆忙、艰辛、欢乐。中央领导和外国专家从我身旁走过，来视察和参观棉花生产和农业机械化，还有李先念主席和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似曾在我这里驻足沉思。

诚然，我也惭愧，当拍岸的洪水突袭，很抱歉很无奈，因为我只能给人一半希望一半叹息。

今天，我已经成为夕阳下安卧的老牛，我的任务早在上世纪末就业已完成。现在，我是人们抚今思昔的媒介，怀旧的人们总会在不经意间来我这里走走看看，或用心交谈一番，所以我健康、我快乐——因为我也看到了改革30年的巨变。

（二）

一到雨季，河水猛涨，“半截桥”无法通行，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要么绕很远过河，要么乘渡船过河，群众一直有呼声——续建半个世纪前的这座桥。但

即便进入了新世纪，资金的问题也一直横在人们面前。

2013年7月7日下午5时许，“半截桥”桥头洪流中又有人涉水过河发生险情了。接到报社转来的热线电话，我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点采访。第二天，《长江日报》《武汉晚报》《长江商报》均发出了我的图文报道《一根竹竿救起落水女子》：

昨日17时许，新洲区举水河因暴雨发洪水，两名年约20岁女子不慎掉进河中，附近众多陌生市民跳进水中施救，最终将她们成功救起。

据介绍，事发地为举水河邾城街老大桥延伸到河对岸的公路上，由于河水暴涨，事发时路面已被洪水淹没。

邾城街饶蔡村6组村民江水华是第一个跳河救人的。江水华是位三轮车司机，事发时他刚从张店送货回来。“当时看到她俩推着一辆电动车在趟水过河，在离对岸约六七十米处时好像发生了意外。”

事发时，其中一位女孩被大水冲进举水河里，江水华奋不顾身便跳进河中向女孩游去。随后，附近一年约30岁的高个男子也跳进河中展开施救。所幸的是，在下游三四百米附近的城西村挖沙工朱双胜、栾七伢发现这位落水女孩，奋勇合力将其救起。

目击者、邾城街邓家湾63岁村民余文华说：“另一位女孩事发时也被洪水冲走，所幸被公路边的水泥墩挡住，5位岸边的村民靠着手拉手，用一根竹竿将其牵引上岸脱险。”

众多陌生人英勇救人的事迹被省、市多家媒体报道后，我趁热打铁，将《武汉新洲举水河半截桥的自白》图文的网络链接发到了网上，“半截桥”再度引发网友热议，也引起了长江日报社领导的关注。记者刘功

虎打来电话向我详细了解“半截桥”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天，他带着摄影记者专程来到“半截桥”西边的饶蔡村、城西村农家采访。巴徐村、大渡村的村干部闻讯也赶来饶蔡村村部等候，他们都想向记者反映老百姓多年的修桥期盼。

在对城西村孙家咀湾、饶蔡村江六房湾村民的采访结束后，我和刘记者一行前往新洲区司法局干部揭兴旺的办公室休息了一会。看得出来，刘记者和揭兴旺关系很好，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原来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大家相见甚欢。揭兴旺盛情挽留记者一行人，中午安排在老工商餐馆就餐。席间，我一直忐忑不安，既想通过媒体呼吁连通“半截桥”，又担心报道做大了会捅篓子，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委婉地向刘记者提出不署我名字的要求。没想到揭兴旺云淡风轻的几句话就消除了我的隐忧，他对刘功虎说：“‘半截桥’是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确实是早就应该得到解决，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再者，现在全市公路都是村村通了，而作为新洲区政府所在地的邾城街出出进进还是走的‘半截桥’，大家对这个问题好像温水煮青蛙都习惯了，也好像是被遗忘了。请你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笔下留情……”

7月1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记者刘功虎的报道：

“半撮桥”勉强连接了举水河两岸，而河的西岸却靠一条便道连接，一下暴雨这条便道就会被水淹没 见习记者 胡琴沁摄（实习生文进彬）

新洲邾城街外、举水河上，有座著名的“半撮桥”：桥梁主体只架设了一半，另一半以普通马路的形式“匍匐”穿越河滩，延伸到新洲西部农村。

近日因为长江、举水同时入汛，这座

桥再度局部被淹，一些人发帖发图到网上，引起不少网友关注和讨论。

13日是入伏头一天，记者从汉口赶到新洲政府所在地邾城街，出西郊数米就到了举水河边，过桥，抵达另一端所在的饶蔡村。这一天大水已经退去，骄阳炙烤下的桥面有卖菜的婆婆推着独轮车缓缓走过。

饶蔡村支书饶新咏介绍，这座桥没有正式名字，人们习惯称为“半撮桥”，始建于1951年，因经济困难数度停工，跨越举水河主河道的那半截实际竣工于1967年，约214米。此桥东端搭在邾城街边，西端则搭在低矮的河滩上。河滩宽400多米。

“1962年前后，政府和老百姓都很困难，拿不出多少钱来建桥，但是通行又是迫在眉睫的事，所以当时主事的干部们弄了个权宜之计，先修一半，通起来再说。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权宜之计一用就用了46年。”现年60岁的饶蔡村老村长江福生介绍。

一块蓝色的牌子提示此桥属于“三级危桥”。记者在现场看到，桥身有多处裂缝。过往村民介绍，一遇大水阻路，人们必须绕

四五公里走下游的一座桥进邾城。而赶急趟水过河的人们，曾多次发生溺水意外。

附近多个村落的干部群众都向记者呼吁，希望有关部门搭建一座新桥，“至少把另半截桥修筑连通起来”。（记者刘功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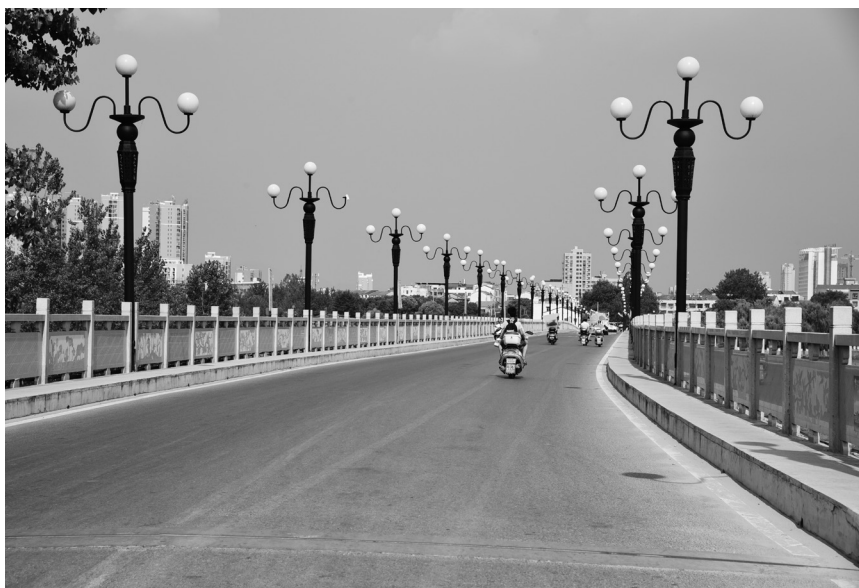
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篇特别报道，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半截桥”连接工程。

《长江日报》关于“半截桥”的报道发出后，很快引起了市交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对此作了调查了解，听取了相关部门的意见，要求尽快拿出此桥的连通方案。新洲区委、区政府的态度也很明确，为响应群众呼声，切实解决邾城举水河西侧百姓进出城区难题，决定新建一座359米的大桥与原举水河老大桥连接。

（三）

2014年8月初，听说老大桥连接工程开工，我在惊喜之余立即赶过去采访，可惜因网络原因，当时的图片没能实时传上去。以下是我发给“长江网”的报道：

新洲区举水河老大桥是一座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半截桥”，全国闻名。从2014年8月20日起，举水河老大桥将封闭连接，大桥连接完工后将极大方便河两岸居民的出行，尤其是汛期，河两岸的居民将不再趟水过桥。“半截桥”的历史即将结束。记者欣闻此消息与众多市民一样高兴，特地赶到现场拍摄了一组图片。



2015年，连接工程竣工后的举水河大桥

新洲区举水河老大桥于1967年建成，桥长214米，宽7米，是新洲城关通往阳逻、汉口的主要通道，因当时建设投资原因只在河床上建造半截桥，在河床另一侧又建一条长430米漫水路与老桥相接，每遇汛期，漫水路被淹，两岸的群众乘船渡河，交通生活极不便利。又因年久失修，老桥属于三级危桥。

老大桥的连接采用公路二级，起于老大桥西侧桥台，止于举水河西大堤孙家咀，河滩路基采用“新建桥梁+对接老桥”形式，建设长度为650米，其中连接线长291米。总投资1700多万元，工程计划于2015年7月底完工。

后来，我还带《楚天都市报》记者余渊到河西部分农家做了相关采访，但出于某些方面原因的考虑，还是谢绝他署我名字的好意，余渊记者也很理解基层通讯员的苦衷，稿子见报后，果真没有我的名字，皆大欢喜。

2015年7月初，老大桥连接工程竣工通车，“半截桥”成为历史。在同两岸群众一样的高兴之中，我当天下午进行了拍摄报道，以下是当天“长江网”发出的报道：

新洲“半截桥”连通举水河 两岸居民48年美梦终成真

（长江网记者 王东升）闻名全国的“半截桥”，近日因连接工程竣工，让新洲区举水河一河两岸的居民在48年后才好梦一“吻”成真。

据河西饶蔡村老村长江福生介绍：1951年开始，在特别困难时期时断时续直到1967年才修建了这座“半截桥”，48年来两岸居民一直期盼有一座完整的大桥。好在这届区委区政府为民办实事才让我们的美梦终于一“吻”成真了。

在桥东做了几十年生意的程爹爹说：以往一到汛期连年发生翻船溺死事故，更给两岸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桥通了，连日来，人们扶老携幼纷纷来到桥上观光、散步，喜形于色，人们笑说这有如新洲版的《清明上河图》。饶蔡村书记饶新咏：老大桥的连通将助推河西的经济腾飞，这也是邾城街一河两岸经济战略发展的具体体现。

续建半个世纪前的这座桥，在新洲引起了强烈反响，老百姓对此纷纷点赞，都夸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了好事、实事。只要心系群众，对群众有利的事就不遗余力地去做，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大手笔”、大项目是政绩，新官理旧事也是政绩，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就更是政绩。

如今，漫步大桥上，我浮想联翩。我拍我写“半截桥”，已有10多年了，我从中发现和感知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老百姓是晴雨表、是温度计，老百姓最有评判权。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坚持改革开放，共筑中国梦，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王东升：新洲区邾城街机关党支部书记）

“省一中”的变迁

◇ 张新强

在湖北省乃至中南地区近现代基础教育发展历程中，有一所被社会通称为“省一中”的学校，具有重要的地位。该校是湖北省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学，曾长期在中南五省招生，培养了大量人才，近现代诸多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都与该校校友相关。例如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陈潭秋是其第一届毕业生，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大屠杀中遇害的烈士陈以文、张国维是其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这所学校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着，至今已 108 年。

1912 年 10 月 16 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当时官方文件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后面不再做此说明）成立，社会上简称其为“省一中”。据史料记载，当年 10 月 10 日为民国第一个“国庆日”，全省放假 7 天，16 日成立该校，是向辛亥革命献礼。此后，这所学校经历改名、迁徙以及多次合并、重组，直到 1955 年定名为武汉市第

十四中学。1912 年到 1955 年这 43 年时间里，人们都习惯称这所学校为“省一中”。

《湖北教育史》一书记载，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名称大概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了。此后出现过湖北省立武昌中学、湖北联中、建始中学、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等学校，大抵都与“省一中”相关，但具体演变过程如何，《湖北教育史》《武汉教育史》等著作没能说清楚，很多表述存在矛盾之处。

笔者在查阅各种档案、阅读大量史料后，基本弄清楚了这段历史。

“省一中”改名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的时间

湖北联中武当山分校校长郑万选回忆：“1930 年 8 月，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成

立（简称武昌高中，校址在两湖书院北段，现湖北艺术学院），校长为杨昭恕。湖北省立一中校名改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武昌中学为一高初中都有的完全中学，六年一贯制，共十二个班。……武昌中学的前身为湖北省立一中，省一中前身为第二文普通中学。

1937年，武昌中学（省一中）校长廖立勋，调充湖北省教育厅股长，继任人为武昌出身的郑万选（尧夫）。郑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8月1日，偕同教务主任石潭龙（逢云）、训育主任陈敬业（文山）到职。

陈诚为了争夺武汉中等学校的职教人员，将武汉原有的中等学校改组为湖北省立联合中学，陈诚自兼校长。校址分设在鄂西、鄂北两大后方。计划设在鄂北的有：湖北省联合中学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派武昌中学（省一中）校长郑万选为分校主任，接收武昌高级中学、武昌中学、江陵中学高中、宜昌中学高中等四校合并改组。”（摘自《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二辑）

根据郑万选的回忆，1930年8月，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改名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并且直到1938年西迁时都没有再变过。郑万选是历史的亲历者，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的回忆可信度应该相当高了。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他所说的湖北省立武昌中学后面往往会在括号中备注为“省一中”。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江文回忆是这样的：“我是1936年暑假考入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高中的。1938年暑假后，由于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学校准备西迁，我便离校去敌后参加抗日工作了……武昌一中当时是湖北省较有声

誉的学校之一，它背倚凤凰山，环境幽静，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学校不仅有宽敞的校舍，良好的设备，而且师资队伍整齐，教学质量较高，因此我们都为能考上一中而感到荣幸。”（摘自《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校史简编》）

江文回忆中的学校，其地址就是在昙华林。但是他的回忆有一个明显的错误，那就是他所考上的学校不叫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也不叫武昌一中。最早的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出现在1946年，它是由四川迁回武汉的国立十二中改组而来。但是从他的回忆可以知晓一个信息，那就是郑万选校长回忆中的湖北省立武昌中学在江文的眼里也叫“省一中”。

《三里坝岁月》（湖北联中建始中学分校校友会编，1988年10月）一书里，秦滢说：“建始中学是其中一个分校。这个分校的学生基本上是原省一中和省高的同学。校长郑万选，字尧夫。省一中和省高这两个学校是当时湖北省最好的两个学校。”在秦滢回忆里没有省立武昌中学名称，但是有校长郑万选。吴国仪说：“武昌省一中、省高中等校，联合组成鄂北均县武当山联中分校，奉命西迁。”王建纲说：“原来我去鄂西之前，在武汉也曾做过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如随省一中抗战救国宣传团到黄冈团风去搞过宣传。”宋廉嗣撰写的纪念陈以文烈士的文章中写道：“以文自幼聪颖好学，尤其喜爱科学，课余也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1935年春，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当时湖北最好的初中——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1938年春，又以第四名考入湖北省当时最好的高中——省立高级中学（简称‘省高’）。同年秋，学校迁往建始三里坝，并入湖北省立联中建始高中（简称

‘建高’)。”仓孝和在纪念陈以文烈士的文章中说：“湖北的两个著名省立中学——武昌中学（简称一中）和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合并成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均县武当山分校，以后又迁建始三里坝。……因为我是一中的，他是省高的，我们本来并不认识，而这次仅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会认识的，直到1939年初我们才熟悉起来。当时陈以文是个有名的‘好学生’。在省高同学中，他的年纪最小，他是一中初中毕业的。考入一中时（一中的初中部在武汉可能是最难考的），名列第一。”至今还健在的杜子才在回忆仓孝和的文章里说：“孝和在学校里数理化、文史地等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抗战初，他从天津来到武汉。1938年春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湖北省学生成绩最好的一所完全中学，即湖北省第一中学（简称省一中，当时改称武昌中学，人们仍习惯地称他为省一中，原址现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高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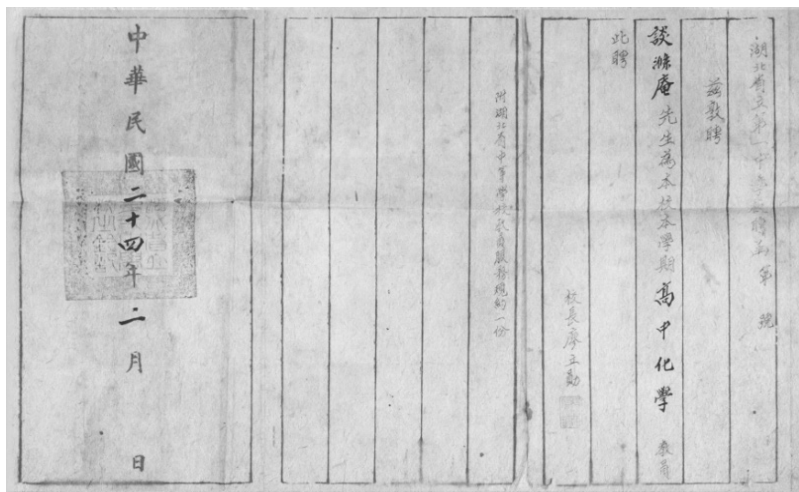
根据这些当事人的回忆，1930至1938年之间，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改名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这是肯定的。但是由于人们的习惯，社会上通称该校为“省一中”。所以在众人的回忆和社会新闻报道中喜欢使用“省一中”这一名称。

《武汉教育史(古近代)》（李珠、皮明麻主编，武汉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有这样的叙述：“（1927年）在武昌方面，以原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为中心，将原武昌甲种工业学校、武大附中等公立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合并后，组建成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学校分设初中

部和高中部。高中部设农、理、文、师范四科，校本部在武昌昙华林，分部设在原武大附中和甲科工校内，省政务委员会委任张朗轩为校长。”“1929年春，湖北省教育厅决定改组大革命时期成立的省立第一中学，将其理科拨归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武大附中，将文科、师范科独立，成立省立师范学校。规定本部高、初两级各6个班，成立新的省立第一中学（校址在武昌昙华林）。迄1931年上学期，改组后的省立一中高中部毕业4届共82人；初中部毕业7届共264人。……20年代末武汉地区虽有几所公办中学，但只有省立一中算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普通中学。”

无论是亲历者的回忆，还是著作者的叙述，都可以表明，1912年至1930年，湖北省立第一中学的名称肯定是一直存在的，即使是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前后，这一名称也没有改变。

但是1930年及以后，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具体什么时间改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的，则存在明显的不同表述。湖北省立武昌中学的名称只在回忆录里和后人的著作中出现，其存在过的理由并不充分。带着这份疑惑，笔者查到了一份聘书（如下图）：



聘书全文如下：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聘函第一号兹敦聘谈涤庵先生为本校本学期高中化学教员 此聘校长 廖立勋（印廖立勋）附湖北省中等学校教员服务规约一份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 日。

这份聘书中最重要的几个信息是：聘书有公章“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之铃记”

（铃记指的是中国古代官方文件或书画、书籍上面的印章符号）；聘书时间是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也就是1935年2月；印刷体的学校名称是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是廖立勋。

郑万选回忆道：“1937年，武昌中学（省一中）校长廖立勋，调充湖北省教育厅股长，继任人为武高出身的郑万选（尧夫）”，他的回忆表明这份聘书有很高的真实性。但是，为什么湖北省立武昌中学的聘书里出现的文字和公章都是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呢？

在湖北省档案馆和湖北省图书馆，笔者查到了几份弥足珍贵的档案。

档案一：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一日，湖北省政府“谨拟任免省立各中等学校校长名单”。文件中首先就是“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郭冰枕拟予免职遗缺拟以廖立勋补充”。该档案证明了郑万选关于廖立勋的回忆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又说明其回忆中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改名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是1930年8月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档案二：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二月，湖北省教育厅督学视察用表之一学校校务概况表。该表填表人为省教育厅巡视员王介菴、向心葵，表中的校名为“湖北省立第



一中学校”，校址昙华林，校长廖立勋。该档案说明，至少在1930年12月，湖北省立武昌中学依然没有出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还存在。

档案三：廖立勋著《考察湖南中等教育报告》一篇，落款为“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廖立勋编”。该档案表明，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到1934年5月还存在。

档案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十六日，湖北省立武昌中学发给湖北建设厅航政处的公函一份，公函署名的校长是廖立勋，公函上公章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铃记”（如上图）。

由上述档案材料可以说明，湖北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名于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还存在着，湖北省立武昌中学的校名应当出现于1935年下半年。毕竟，有不同校名的文件署名都是廖立勋，且没有发现并存着同一署名、同一时间却是不同学校名称的文件，至少说明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和湖北省立武昌中学不是两所不同的学校，而是同一所学校的先后名称。这一点，诸多校友回忆录可以与其互相印证。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在1935年下半年更名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社会上将这前后相继的两所学校通称“省一中”。

“省一中”的西迁与校名的不断变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湖北当局决定将武汉及周边大量学校西迁鄂西和鄂西北。1938年7月，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主持召开了全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将全省47所省立、市立和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合并为湖北省立联合中学（简称湖北联中），陈诚兼任校长，设22所分校。8月30日，湖北联中开始西迁之路。

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级中学分校是22所分校之一，由湖北省立高级中学（通称“省高”）、湖北省立武昌中学（通称“省一中”）以及江陵中学高中部、宜昌中学高中部组成（到底有哪几所学校组成还存在不同记载，本文不予论述），校务主任为湖北省立武昌中学校长郑万选。

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级中学分校本应迁往均县，但到达沙市时因时局变化不得不迁往恩施，直到年底才到达建始县三里坝。1939年7月，湖北教育厅令改校名为“湖北建始中学”，分校主任改称校长，郑万选为校长。由此，“湖北联中”的名称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1940年夏，宜昌陷落，鄂西形势紧张，省政府将建始中学初中部搬迁到宣恩县高罗镇，校名宣恩初级中学，而位于三里坝的建始中学改称建始高级中学。这年秋季，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主持省政，将全省分为八个专区，在湖北省各个专区各设一所省立高级中学。第一专区在咸宁，设湖北省立第

一高级中学，校长万国钧；第二专区在黄冈，设湖北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校长蔡礼成；第三专区在钟祥，设湖北省立第三高级中学；第四专区在江陵，设湖北省立第四高级中学；第五专区在襄阳，设湖北省立第五高级中学；第六专区在宜昌，设湖北省立第六高级中学，校长郑万选；第七专区在恩施，设湖北省立第七高级中学，校长李叔熙；第八专区在郧阳，设湖北省立第八高级中学。

也就是说，刚刚改名为建始高级中学的建始中学又改名为湖北省立第六高级中学，校址仍在建始三里坝。

1946年春，湖北省立第六高级中学奉命迁到宜昌市（建国后不久改名为宜昌市第一中学），所有仪器图书也都搬到了宜昌。但是部分原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的教职工自动离职回到武汉，后成为复建的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校址最终定于千家街）的教职工。宣恩初级中学部分师生则回到县华林，奉命重建“省一中”。

从1938年夏天西迁恩施建始县三里坝，至1946年春学校部分员工回到武汉，这一时期不存在“省一中”的名称，无论民间还是官方，一般都称作“联中”。但是最初的几届学生往往会说自己当年考入“省一中”然后西迁。

1946 ~ 1955 年的“省一中”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校史简编》里，1946年到1952年之间位于县华林的学校被记载为“湖北省立武昌第一初级中学”，时人简称其为“省武一初”或“省一中”。1946年至1949年，小东门、宝积庵等地有学校名为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时人也简称其为“省武一中”或“省一中”。1952年，

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在昙华林建立，时人依然简称其为“省武一中”或“省一中”。这些简称散布在不同学生的回忆录中和一些著作中，极容易让人犯迷糊。

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的前身是位于四川长寿县的国立十二中。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大量青年学生涌入大后方四川，为了使这些失学青年能继续接受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四川各地根据省籍建立若干国立中学。国立十二中就是接纳湖北省籍青年学生的学校，1939年10月1日开课，陶尧阶为校长，共有高初中20班，共录取学生1218名。1945年7月，陶尧阶辞职，陈祖炳继任，班级已增至29个，教职员工达百余人。1946年，该校奉令搬迁到武汉办学，初中部地址在今小东门一带，高中部地址在今湖北大学一带（称宝积庵）。学校改名为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1947年5月，陈祖炳辞职，朱和父（有光）继任校长。1947年8月，初中部被划出独立成校，定名为湖北省立武昌第二中学，熊寿珩为校长，演变为今天的武汉市第十五中学。1948年5月，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校长朱和父调任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高扬勋接任校长。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并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校名定为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校长高扬勋。

所以，1946～1949年之间存在于武汉的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与1912年在昙华林诞生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后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1952年去掉“立”字的湖北省武昌高级中学与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合并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的缘故。

因此，1946～1949年之间的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简称应为“省武一中”，不能

称为“省一中”。但是，1946年在昙华林重建的“省一中”，其完整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是怎样演变的呢？

熊贤君著《湖北教育史》（下卷）《1948年湖北省普通中学一览表》中记载的是：1948年位于昙华林的学校名称为武昌初级中学，班级12个，学生691人。

笔者查到聘书两份（如下图）。一份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一日，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聘请王瀛洲为学校书记的聘书，聘期到民国三十七年元月三十一日；一份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一日，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聘请王瀛洲为学校书记的聘书，聘期到本年七月三十一



日。两份聘书中都有学校铃记，校长都是万启宇。这两份聘书可以说明当时武汉存在一个叫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的学校，那这所学校是不是《湖北教育史》中所记载的1948年位于昙华林的那所学校呢？

笔者又找到一份赵璧的毕业证书（如下图），证书颁发时间为民国三十八年四月（1949年4月），学校名称为“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校长万启宇，证书中有学校铃记和湖北省教育厅印。前面的教职员聘书、这里的毕业证书都是一个校长，字体一模一样。

根据以上三份材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省一中”从恩施迁回武汉后，依然在昙华林重建，校名定为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人们依然称其为“省一中”。那么，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的名称存在了多长时间呢？

笔者又找到了一份武汉解放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后改为文教厅）任命谢敬止为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校长的文件，时间为1949年8月1日，此时武汉已经解放

近三个月，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为李实。

还有一份档案是1950年3月14日的，为“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用签”书写的文件，内容是向鄂南电力公司报告水费已经缴清，以及鄂南电力公司的回复。

上述两份档案可以说明，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名称至少存在到了1950年上半年。

笔者又发现了以下几份档案，可以说明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名称消失的时间。

一份是1950年秋季湖北省公立中学概况调查表。表中第七所学校为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校长谢敬止，地址昙华林，教职员47人，学生311人，全部为男生。

一份是周法慎的肄业证明书（如右图），证明书中，学校名称是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校长是谢敬止，时间是1951年1月11日。

同一位校长谢敬止，前后出现在两所不同学校的文件和证书中，说明这两所学校之间具有延续性。也就是说，1950年下半年，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更名为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

这里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要去掉“立”字。这是因为“立”字头的学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国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为了保证教育的延续性，当时国家教育部和中南教育部都规定原有学校一律不动。到1950年，社会基本稳定，各地开始对学校进行整合，学校名称也就发生重大变化。湖北省档案馆存有如下命令的一份档案：1950年12月29日，湖北省文教厅转中南教育部令，发布教秘字第352号令，即关于公立学校概不冠以“国





立”“省立”“县立”“公立”字样的令。也就是说，在中南教育部还没有发布此令之前，武汉市已经开始有学校改名了。

可以得出结论：老“省一中”从1946年由恩施回迁武昌县华林后，学校名称就定为“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至1950年秋季改名为“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由于历史上湖北省立第一中学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人们依然习惯上将1946年春到1950年夏之间位于县华林的湖北省立武昌初级中学，以及同样位于县华林的1950年秋至1952年夏之间的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都称作“省一中”。

这里还得说说“省高”。20世纪30年代，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在今解放路武汉音乐学院一带成立，简称“省高”。1938年，该校与“省一中”等校一起并入湖北联中武当山分校，1946年在武昌重建，校长萧济时；1947年校址定在千家街，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所在地。1949年，湖北省立武昌第一中学并入该校，组建了新“省高”。不久，新“省高”去掉“立”字，更名为湖北省武昌高级中学。

1952年，位于千家街的湖北省武昌高级中学、位于县华林的湖北省武昌第一初级中学、位于郎家巷的私立文学中学合并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

经过一系列的合并、重组、改名，1952年成立的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就成为了一所包括初、高中在内的完全中学，它将“省一中”“省武一中”和“省高”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师资队伍十分强大的新“省一中”，其教学质量在当时湖北省首屈一指。

到1955年该校改名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之前，人们仍然习惯称这所学校为“省一中”。从历史角度出发，把1946~1955年间的“省一中”称作新“省一中”更好。

1955年，继承了新“省一中”衣钵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依然在整个武汉教育界保持强大的地位。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建设人才，如桂希恩、胡正寰等。那个年代的武汉人，只要谈起武汉的中学，首先想到的就是“省一中”或者十四中。1959年，武汉大学看中了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经湖北省委批准，一度（1960~1963年）把十四中变为武汉大学附属中学。1963年，十四中成为湖北省首批重点高中。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响当当的“省一中”，师资力量大损，盛名不再。

（张新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高级教师）

1938 年唱的《保卫大武汉》是哪一首

◇ 曾宪德

2016 年 7 月，我在拜访武汉近代史“活字典”徐明庭先生时，他很严肃地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他曾在回答媒体采访时，谈到 1938 年他作为小学生在学校学唱、并参加“保卫大武汉宣传周”演出的《保卫大武汉》歌曲，记忆中是由郑律成作曲的。但后来他自己对此产生了疑问。他问我：为什么有资料介绍是冼星海同志作曲的？郑律成同志当时在武汉吗？

老先生怕自己误导了媒体，委托我查证是否合乎史实。我受他信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查阅了一些当年的资料，对作曲家后代作了调查采访，现将答案与大家共享，同时也算是对已仙逝的徐老有了交代。

（一）

我在报刊媒体读到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有关文章，多数在介绍 1938 年武汉抗

日歌咏运动时，谈到“保卫大武汉宣传周”中高唱的《保卫大武汉》歌曲，果然都着重介绍了郑律成作曲的一首，且有文章引徐老的回忆作为引证。

我查实徐老的记忆并没有错。其实当年流行的《保卫大武汉》歌曲并非仅此一首。

1938 年“保卫大武汉宣传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直接组织进行的，在三厅任职的冼星海在武汉所作两首以“保卫大武汉”为题材的歌曲的影响，显然不容置疑。

1938 年 6 月 11 日夜，日军发起对安庆的进攻，武汉会战正式开始。当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保卫大武汉》。6 月 27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正如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所说：“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武汉人则空前严肃地担当起了自己神圣的历史和民族使命。

根据国民政府计划，不让战争在武汉市开展，而将战场遍布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投入总兵力近110万人，是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后虽武汉失守，但我方战略意图已经达到，抗战从此进入相持阶段。而日军则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从此不得不由狂妄的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

武汉会战时期也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加强合作最和谐的时期。这段时间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声势尤为突出。

我父亲曾昭正当年曾作为冼星海同志志同道合的挚友，身体力行参加了救亡歌咏活动。50年后，父亲在回忆录中将当年的盛大活动总结成“六个周，六纪念，三祝捷，三追悼，单独九项，歌咏大会五次。”而经国民政府决定、由三厅领导发起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的“七七献金”运动和同时进行的“保卫大武汉宣传周”，是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

据我父亲回忆录记载，这次宣传周自7月6日至13日。事前由三厅召开了联席会议。三厅在汉口的办事处在今武汉关不远的江汉路一楼房中。会议由冼星海、张曙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歌咏协会代表盛家伦、贺绿汀、刘雪庵、林路、马丝白、曾昭正、李行夫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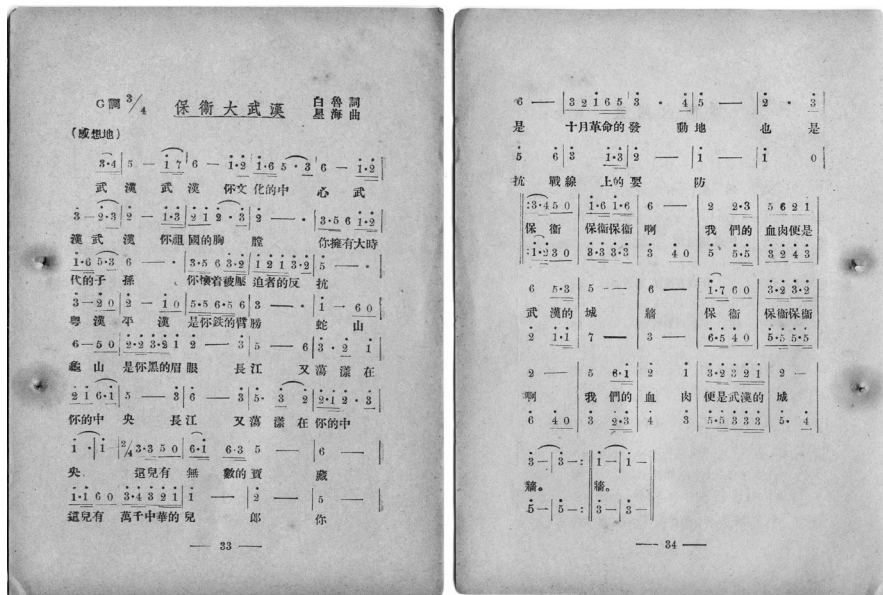
汉业余歌咏团、海星歌咏队、三八女子歌咏队以及武昌工人歌咏队、钢铁工人歌咏队、青救歌咏队、孩子剧团歌咏队等 20 多个歌咏团体代表参加。会议布置他们分别向武汉三镇各工厂、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以及近郊农村开展宣传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演街头剧、歌咏、宣讲、洗衣、缝补、写书信、送慰劳品等。

这是武汉歌咏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深入群众的活动。

(二)

从7月6日起，武汉全体市民开始素食禁屠，开展为期三天的纪念抗战开始一周年的献金运动。其中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不计其数，本文暂略。首日下午集会游行结束后，各宣传队伍自行向武昌黄鹤楼集中，参加三厅组织的水上火炬大游行。

这几日，几首广为传唱的《保卫大武汉》，就是在此背景下日夜响彻在武汉三镇



1938 年，白鲁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抗战歌曲《保卫大武汉》
影印件

和扬子江江面的。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场面，让亲历者晚年提起仍泪若泉涌，激动不已。

父亲回忆当年的场面：

……夜色降临的时候，各条船上的火把陆续点燃。多达 50 万民众举起自制的火炬，从四面八方汇来，将蛇山和江面洒满金红相映的光辉。

……田汉在岸上指挥万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水上火炬游行正式开始了。在火把和探照灯照耀下，星海伸展双臂在大船上指挥。几十万游行的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唱起了一首首抗日歌曲。船在江上顺岸游行，岸上的人配合着唱起。

《保卫大武汉》等歌声有如一道铁的洪流掀起的波涛声，冲破江城的夜空，震撼着云霄。

大武汉，大武汉，
它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它是中国的凡尔登，
东方的马德里！
……

数百只大小船只，排列长达几百米，岸上的游行队伍则在马路上同向并进。因江水已几乎涨平江边的马路，于是船上和江岸隔得很近，水陆火光彼此相映，歌声则连成了一片……

我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证：

我 93 岁的老母亲仍健在，她是当年业余歌咏团的活跃成员。于是我再次专门询问母亲当年的《保卫大武汉》怎么唱，她不假思索立即唱出近 80 年仍铭记在她心底的歌曲：

……大武汉，大武汉，
它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它是中国的凡尔登，
东方的马德里！……

我便向母亲提出疑问：这与郑律成同志的那首词、曲都不相同啊？而母亲思维清晰，她一口断言，当年他们唱的是冼星海同志作曲、并亲自给他们教唱的！

冼星海同志亲自教的！

查阅冼星海日记，更证实了母亲的记忆。

冼星海同志在《创作杂记》中写道：“《保卫大武汉》是在武汉危急时所写的，词作者是光未然，这曲唱遍了武汉三镇。”

这当然无误了，但这段文字表明，他提到的还不是曾有媒体报道过的白鲁作词的那首《保卫大武汉》，词作者是光未然。

应该还有第三首！

（三）

于是我用电话询问冼星海同志的女儿冼妮娜，又通过她联系了郑律成同志的女儿郑小提，终于搞清了以下事实：

其一，郑律成当时确实不在武汉，并一直没来过武汉。由他作曲的《保卫大武汉》，是他在延安为武汉保卫战而作，其词作者为沙旅、尔东，歌词是：

热血沸腾在鄱阳，
火花飞迸在长江，
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
保卫大武汉！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
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
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
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
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其二，既然冼星海同志在《创作杂记》中写的那段文字提到的不是白鲁作词的那首《保卫大武汉》，那是哪首呢？为此我查

阅了冼星海同志在武汉的作品，终于找到一首光未然同志作词的《保卫东方的马德里》，果然曲调与我母亲唱的一样，歌词是：

拿出你的力量，
拿出你的金钱，
加入正规军，坚持持久战，
组成自卫军，发动游击战。
大武汉，大武汉，
它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它是中国的凡尔登，
东方的马德里！
组成救护队，宣传队，运输队，侦察队，
劝募队，锄奸队，自卫队，
齐把战斗的责任担负起。
军民成一体，抗战直到底！

（口号，一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众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武汉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口号，一人：大武汉是我们的！众人：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其三，我在1938年冼星海亲自组织出版的《抗战歌曲集》第二集上，找到了白鲁作词的《保卫大武汉》，据报道，这首歌也流行非常广。歌词如下：

武汉、武汉，你文化的中心，
武汉、武汉，你祖国的胸膛。
你拥有大时代的子孙，
你拥有被压迫者的反抗。
粤汉平汉是你铁的臂膀，
蛇山龟山是你黑的眉眼，
长江又荡漾在你的中央，
长江又荡漾在你的中央，
这儿有无数的宝藏，
这儿有万千中华的儿郎，
你是十月革命的发动地，
也是抗战线上的要防，

保卫保卫保卫啊，
我们的血肉便是武汉的城墙！
保卫保卫保卫啊，
我们的血肉便是武汉的城墙！

此为1938年版本，词中的“十月革命”指辛亥革命，以后所见的版本都作了改动。

其四，据报道，当年流行的相同主题的歌曲还有，例如下面这首（可惜我尚未找到作者）。

歌词是：
龟山蛇山鼓着眼睛，
汉水江水发出了吼声。
敌人的坦克车，
冲不动我们的和平阵线；
敌人的飞机大炮，
炸不倒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我们要为民族生存作更大的牺牲。
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去。
去牵制敌人，扯住敌人，扰乱敌人，
让敌人不得稍停，
让敌人不得安宁；
让它打不通粤汉，回不到东京。

我们文艺前辈们，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写下了大量的优秀爱国歌曲。正如冼星海同志所说：救亡歌咏运动“成为了抗战的文化阵线的一部分，是全民抗战力量的一道铁的洪流。”当年激昂的歌声，有力地唤起了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斗争热情，带领大众对帝国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我们当世代相传！

（曾宪德：汉口老通城创始人曾厚诚长孙）

任桐祖孙的江城情怀

◇ 郭燕华

“本是异乡客，求学到江城。时运不佳愁生计，候官无望做经营。超前规划‘大沙湖’，私办旅游创意新。精心设计建琴园，惊动鄂汉数万人。”这是浙江来汉移民任桐的人生写照。他关于“大沙湖”的旅游规划设想，在100年后得以实现；他的裔孙不忘先志，想方设法为建设生态沙湖拾柴添薪，诠释着任氏家族几代人爱恋武汉的情怀，可贵可嘉。

（一）

任桐（1868～1932年），原名任洞，原籍福建，清初迁居浙江永嘉任桥（今属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任桥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家业逐渐兴旺起来。鸦片战争

以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加之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任家受到直接冲击，终至收不抵支。战事平息后，仍然难振前雄，只能勉强过日子。任洞嗜爱丹青丝竹，认为桐木是上好的制琴材料，遂更名“任桐”，取字“琴父”。他喜欢旅游，读书之余游历山川名胜，东起雁荡，南达珠江，西抵三峡，北及京师。这些游历为他后来践行旅游设想奠定了基础。任桐曾三次科考落第，此后再也无心“科考入仕”，开始谋求新的出路。时值湖广总督张之洞实施“实业兴鄂”，创办新学，他决意赴武昌报考新式学堂。1900年，任桐筹集500大洋出发，不料途经上海时，所带钱款被人骗走。虽然费尽周折追讨回来，却耽误了时间。当他抵达武昌时，得知学校报

名期限已过，要报考只得等待来年。由于书画功底出众，他被引荐到北距武昌城 50 里的金口商埠局做文书。替人代写文案薪酬微薄，维持家庭生计总是紧巴巴的，任桐只得返回省城武昌，等待机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他通过“纳粟入仕”，花钱捐了个“候补官员”的资格，实为一个等候递补的虚衔，一候就是 10 年。1911 年，武昌首义，清王朝宣告终结，旧的官僚体系重新洗牌，任桐“递补”无望。来汉 12 年，任桐命运多舛，作为一个外乡人，或许可以逃离这个地方而另择枝巢，但他没有。他自憾却不气馁，认定武汉就是他人生的第二站，决定弃政经商。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社会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渐趋近代化，新型生活方式逐步渗入平常家庭，社会环境变化使任桐的人生出现了转机。他在沙湖西边沟口（今武昌徐家棚一带）置业经商，经过 10 多年的打拼，终于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从任桐此后的投资项目与规模看，这笔资金相当可观。然而他的目标不是追求日益递增的财富积累，而是有着更加宏大的愿景，那就是推动正在兴起的新型旅游。他突出的贡献在于对武汉旅游事业的创新设计与经营管理方式，从而成为武汉近代史上率先较大规模民办旅游的代表人物。

（二）

早在客居武昌不久，任桐伫立沙湖之滨，近看湖面宽广，湖水明澈；远眺洪山、九峰、灵泉诸山，层峦叠嶂。他不由将其与杭州西湖相比。西湖早已声名远播，而此湖犹如待字闺中的千金，开发利用的前景非常广阔，于是任桐确信此湖“若造化

得法”，将来一定会赶上甚至超越西湖。

任桐眼中的“沙湖”，实为“大沙湖”，即是宋元明清时期统称的“东湖”。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东湖，在县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临之胜。”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和清同治八年（1869 年）《江夏县志》均沿此说。这片水域原本相通，并经青山港通长江。清代以后才被分而称作沙湖、东湖、郭郑湖等。近年在武昌积玉桥发现船埠遗迹，表明此地原是码头。因为水位下降、城市基建等原因，湖区面积逐渐缩小，且离武昌古城越来越远，演变成现在被分隔成多个湖泊的格局。1954 年，朱德委员长曾写下“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的诗句，和任桐的这一见解遥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湖名声鼎盛的年代持有这种预见，常人看来好像难以理喻。

任桐构思的“大沙湖”旅游规划，其范围在现今沙湖、东湖一带（《沙湖志》内容涉及民国初年武昌县全县），东起八叠山、吾塘湖，南达灵泉山（今龙泉山，又名夹山）、梁子湖，西至八分山，北抵长江，包括现今武汉市武昌、洪山、江夏、青山 4 个区级行政地域（参见《任桐“大沙湖”涉及地域示意图》）。

为了实现他的预见，任桐在沙湖滨买下一屋，自称“沙湖居士”，潜心研究旅游资源。他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考察，从地方志书、家乘手卷等文献中，考察搜罗自然条件和人文资源，“十余年搜索备至”，著就《沙湖志》《园林春色》两本文集。

《沙湖志》共 10 章，包括大沙湖 16 景、其他湖泊景观 6 个、山景 29 个、名胜古迹 53 个、历史人物 67 个、寺观庙宇 25 座、村集 21 个、土特产品 6 种、民俗 10 条、杂录 24 条。他依承历代文人常用的手法进行

提炼,以增添景点的人文气息。在第一章中列举的“大沙湖十六景”,既有景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提炼加工,又有景点的设计构思。“十六景”是:现今东湖的“琴堤水月”“雁桥秋影”“鸥岛浴波”,珞珈山的“金冢桃花”,洪山(原称东山)的“东山残碣”,九峰山的“九峰晨钟”,青山矶的“青山夜雨”,卓刀泉的“卓刀饮泉”“泉亭松韵”,灵泉山的“夹山咏雪”“虎岩云啸”“兰岭香风”“石壁龙湫”,梁子湖的“梁湖放棹”。另有“寒溪渔梦”,典出宋代状元冯京“醉寓武昌”的一则传闻,参看《沙湖名胜全图》,此景标注在东湖南岸;仅有“沟口夕阳”在小沙湖南岸。就内容来看,《沙

湖志》具有民国初年版“武昌县旅游指南”的功能。而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求所有景点能够统筹打造,形成共鸣效应,符合旅游学中旅游资源综合利用原则,又试图通过发掘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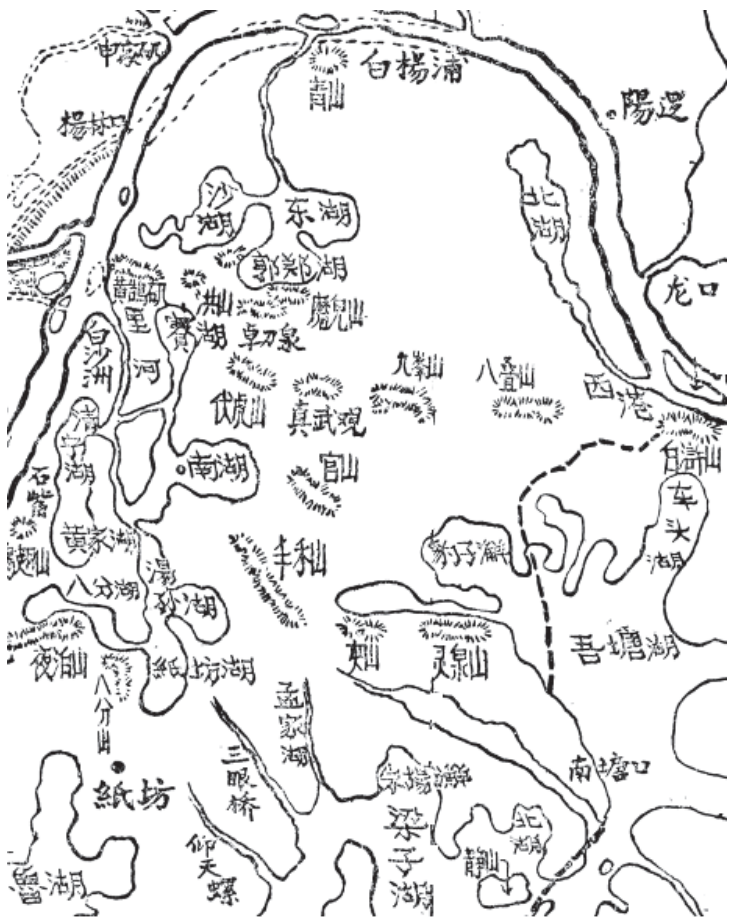
《园林春色》一集,有自传,有诗词,也有琴园建造方案。其中亭台楼阁的规格样式、外观内饰,所有景点楹联题咏,都是他本人推敲雕琢,自作自书,可谓殚精竭虑。可以说,他将毕生智慧和后半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武汉旅游事业。

在规划设计方面,任桐有自己的主见。虽然当时盛行“西洋味”,但他仍然尊崇“中国味”的传统。琴园开建初期,一座

小楼的设计方案未经他审定,且在他进京办事期间开工建设。当他返回看到小楼设计是西式风格,立马命人拆除,改为中国传统园林格局设计。园内开凿了人工河,辟有花园、池塘、假山,设有茶楼、戏院、照相馆等娱乐和服务设施,后来还配有游艇。琴园气势恢弘,成为江城一大盛景。武汉地域文化学者郑昌琳(1919~2004年)评价:琴园是当时武汉三镇唯一的一座具有现代特点的山水公园。除琴园外,他建造的旅游设施延伸到现今东湖区域,如湖山第一、引胜桥、永嘉别墅、望书亭、白鸥亭、念西居士林等,建设工程到1927~1928年达到鼎盛。

(三)

旅游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让人知晓,吸引游客。任桐通过打“名



任桐“大沙湖”涉及地域示意图(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

人牌”开展推介活动,利用“大人物”来造势。他的好友扬铎(1892~1967年)参加过武昌首义、反帝爱国斗争和新文化运动,在本地文艺界小有名气。1924~1925年,相继写下三篇文章帮助推介沙湖。第一篇为《沙湖游记》,1924年5月,扬铎应约游赏沙湖。他看到湖山景色颇为心动,表示“将与琴父(任桐)争此湖山快婿而为神仙眷属”,“欲分一隙地,辟作静园”,以备颐养天年。第二篇为《沙湖序》,是1925年7月为任桐即将付梓的《沙湖志》所作。扬铎说:“求数顷之田于沙湖之上,以为躬耕之资。”闲暇之时,“入九峰,上灵泉,渡梁湖,历石壁、夹山、寒溪……狂歌长啸,顾不乐哉?”以亲身经历和体验来称颂、宣传大沙湖。第三篇为《沙湖征文启》,1925年8月,扬铎和任桐希望更多人士“以沙湖为绍,先结文字因缘”,以文会友,并发起成立“沙湖建设会”。扬铎将上述三篇汇集成册,称作“沙湖三唱”,向社会推送。在当时信息传播手段并不发达的年代,有个热心朋友鼎力相助,可谓如虎添翼。任桐其人、新型休闲公园,以及“大沙湖”,渐为世人知晓。近代改良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曾以“琴”“园”为首字为之创作楹联:“琴谱茶经轮换风雅,园花池月悟彻禅机。”国民政府政要、书法家谭延闿(1880~1930年)为其《园林春色》题署书名。《旅行指南》杂志1934年第7期刊载:“亭台池榭布置得宜,花木著密,足供游览。”越来越多的人知晓琴园及其旅游设施。一些人士纷纷仿效,或改建装修自家庭院,或建造西洋式别墅,而他们的建造规模、投资风险均不及任桐的设施建设。在当时视为“荒郊野外”的地方开辟休闲游乐场所,没有足够的胆量难以做到,可谓“敢为人先”之举。

(四)

在经营策略上,任桐主张“务求斯湖之盛名腾跃于全世界”,以此为定位来做规划、造人气、创品牌。他善于利用适时发生的事件“现炒现卖”,使得在荒蛮湖滨建造的琴园变得“有故事”。其长孙任世铎回忆:琴园选址源于收养一个弃婴。那天任桐与友人在去商埠的路上,蓦然看见前方乌柏树下窜出一条狗,嘴里叼着一件包袱。狗见到人,惊慌之中丢掉包袱逃窜。他们打开包袱一看是个弃婴。他觉得在方圆几十里少有人烟的荒野,天赐女儿是难得的缘分,就把女婴抱回家,细心抚养,视同己出。同时决计以乌柏树为中心营建琴园,并将该树保留在琴园里。任桐给女婴取名“我改”,有多重意蕴,无论是弃婴命运将会改变,还是他本人由此“转运”,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事业的确出现“时来运转”的势头。故事既衬映出他的慈善,又赋予了琴园传奇色彩,增添了琴园的文化意蕴,更容易勾起人们一睹为快的好奇心。

事如所愿,琴园开张,民众慕名而来,“琴园值得一看”的说法传扬一时。当然这与他的开放理念和规范经营密不可分。从琴园门票的设计之“一斑”,可见其经营管理的“全豹”。现存的1918年和1920年门票印有:“票价国币五角;一人一券,三尺以下幼童随成人免票;爱护花木讲究卫生,玩水攀树后果自负;持券入座茶楼免费。”既符合“有玩有喝、有买有送”的大众消费心理,又能让游客再做推广宣传。但是由于后来战事频发,社会动荡,民众以营生为务,游园人数渐次减少。1931年武汉涨水,琴园损失惨重。1932年任桐病逝,无异于雪

上加霜。1938年武汉沦陷，琴园沦为日军兵营，设施器材损毁殆尽。琴园的衰落更多归于动荡的社会环境。

任桐建造旅游设施的初衷是“不私于己而公于人”，即便是资金拮据、心力交瘁之时，也是咬紧牙关，负重前行。面临基建项目需要筹措资金，心理压力颇大。他在1923年除夕所写的《沙湖记》描述了当时的窘迫感，也表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面对重重困境，仍然不改初心，这种执着深深感召着后人。任世铎追忆：“祖父曾说，琴园将来要交给社会，不私于子孙。”后人铭记先辈的教诲，时常关心沙湖建设进展，力求为地方文化建设尽一份力。

（五）

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任世铎先生，深知文献资料的价值。1997年，他将任桐《沙湖志》原本赠送给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题写赠言：“今将先祖父所著《沙湖志》原本一册，敬赠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存。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任世铎寄自上海。”并郑重地钤上印信，书后附加了一张郑昌琳于1983年改绘的《沙湖名胜全图》。郑昌琳对任桐与《沙湖志》情有独钟，为方便查看，将原图改绘成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格局。

2013年，武汉当地政府依照《沙湖志》及相关记载，在沙湖公园建成一座“新琴园”，基本保留了老琴园的风貌。任桐的重外孙刘敦诏写下游览感言：随着武汉的崛起，琴园得以重建，东湖和沙湖实现连通，实现了“百年圆梦”。又赋有《满江红·盛世沙湖》一词：“逢盛世，华章奏，情犹在，夙愿酬……而今后，民众休闲处，任君游。”

文中洋溢着讴歌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和武汉城市建设成就的真诚情怀。

2014年，任世铎由上海移居武汉。《长江日报》报道：当年10月7日他应邀参观游览重建中的沙湖公园，在此欢度95岁生日。任世铎说：“祖父任桐被后世称为沙湖开发第一人，他在遗著《沙湖志》中提出的设想，如今大多变为现实，感到十分欣慰。”任氏家族10余位裔孙陪同长者欢庆这个非同寻常的生日，并在任桐塑像前合影留念。他们在公园拟写的“中华逢盛世，琴园换新颜”题签，洋溢着对武汉城市文化建设的赞美之情。在沙湖公园“百年琴园历史图片展”开展仪式上，任世铎等人向园方捐赠了珍藏多年、祖父祖母穿过的2件皮袍和祖父用过的木箱。3件“百年古董”讲述着一个沙湖文化创始人传奇般的故事，从而增添了沙湖公园的文化积淀。

而今，地处沙湖之滨的湖北大学涌起传承沙湖文化的热潮。沙湖文化已成为校园文化的组成元素，其渊源亦发轫于任桐。任桐来到第二故乡武汉，经历了报考过期、捐官无望、开铺经商，最终选择投资旅游，追赶时代新潮，既实现了个人愿望，又适应了当地文化生活的需要。他的裔孙一如既往地寄情沙湖，怀着对“大江大湖大武汉”的真情，仿佛在帮他续一个缘、遂一个愿，传承着对江城武汉满满的眷恋情怀。

（郭燕华：江汉大学副教授）